

第二章 地理語言學的定義、產生與發展

第一節 地理語言學的定義

一、地理語言學的特點

方言學依其研究目地與方法的不同，洪惟仁（2003）將其分為：方言學（傳統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三個範疇。雖然分為三個範疇，但三者之間並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分為三個範疇的主要原因在於三者研究的著眼點不相同、研究方法不同；展示成果的方式也不相同。傳統方言學研究目的在詳細而完整的呈現一個方言的形式內容與結構；地理語言學研究目的在把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布展示成語言地圖，進行方言分區並對此語言分布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社會語言學研究目的則在於把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布以數據的方式展示成圖或表。另外三者之間又具有階層性的依賴關係：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在進行調查研究之前必須對這個語言的結構有完整而詳細的掌握，因而傳統方言學可以說是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基礎。

地理語言學在臺灣並不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從事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然而當我們翻閱這些資料時，卻可以發現許多資料往往對地理語言學的定義模糊不清；更有些人以為，只要在方言研究上附上方言地圖，便是屬於地理語言學。

既然要從事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必定要先認清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的特點和定義，如此才不會偏離研究的旨趣。關於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特點，賀登崧（1981/2003）認為是¹：

「(1)慎重遴選少量語音、詞彙以及語言片斷，到較多的地點進行調查，記錄下其發音。

(2)每個調查項目制作成一張地圖。這時，對語言資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實際記錄到的形式表示出來。

(3)把詞及其所指對象聯繫起來，也就是要研究詞彙中所反映出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現象。

(4)對地圖進行解釋。對於語言學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工作，這是要以上述三項工作為前提的。語言地圖的作用是為語言（方言）間作比較、為語言演變的歷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們能夠確定語言和文化的地理界線，也能夠進而研究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的問題。」

由賀登崧的說法，可以知道地理語言學研究方法的重點在於：

(1) 以少量的調查項（可以是語音、詞彙或是語法），調查多個地點。

(2) 一幅語言地圖只呈現一個調查項。

(3) 以詞為調查重點。除了調查這個詞的分布外，同時要配合研究這個詞

¹ 見賀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禮譯《漢語方言地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一章 p1。另原書是稱「語言地理學」，即是本論文所說的「地理語言學」。

在當地所反映出的人文現象。

(4) 對語言地圖進行解釋，是地理語言學研究最重要的工作。語言地圖可為共時的語言或方言間的比較研究與歷時的語言演變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5) 另外在延伸研究上，可以結合人文地理與歷史，進行語言和文化相互影響研究。

所以曹志耘（2006）為地理語言學下的定義²：

「地理語言學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的機制。」

如果我們利用 Chomsky (1964) 語法研究的「妥當的三個層次」(three levels of adequacy) 理論，來審視曹志耘的地理語言學定義：

(1) 合理而正確地進行語言調查並記錄。——這是達到了「觀察的妥當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

(2) 整理調查資料，並利用繪製語言地圖的方式來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這可以說是達到了「描寫的妥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

(3) 結合語言變異理論、歷史演化、語言接觸、移民、交通、經濟、政治、教育、心理等等社會文化因素，來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機制、成因、規律或原理。——這才可以說是達到了「解釋的妥當性」(explanatory adequacy)。

因此地理語言學絕不是止於語言地圖的繪製，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分布、為什麼會有這些變異以及語言變化過程的機制是什麼。其中，要確實掌握的是，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主體是「語言」，而不是「地理」。如果本末倒置，那就不是語言學研究的範疇，而是地理學的研究了。

二、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分野

那麼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分野又在哪兒呢？我們可先從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名稱來討論。曹志耘（2006）曾對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等相關術語的使用頻率做了以下的統計³：

排序	英文術語	出現次數	中文術語	出現次數
----	------	------	------	------

² 曹志耘〈地理語言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中國方言學報第一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174。

³ 曹志耘是利用 Google 在網路上搜索有關術語的出現次數，但未了避免混入日語材料，所以搜尋範圍限制在簡體中文網頁。所以我們並無法確實知道這統計資料中是否包含了臺灣部份，或者是臺灣部份佔了多少比例，因此並無法展現臺灣地區實際使用的情形。然而由於目前兩岸三地的學者交流頻繁，所以筆者認為這是華人學者一般的認知或使用情形，因此仍然俱有參考價值。

1	linguistic geography (語言地理學)	18800	方言學	2470
2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地理語言學)	8100	語言地理學	169
3	dialect geography (方言地理學)	46600	方言地理學	47
4	dialectology (方言學)	29100	地理語言學	45
5	areal linguistics (地域語言學)	6050	地域語言學	2
6	geolinguistics (地緣語言學)	1470	地緣語言學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西方語言學上多用“linguistics geography”這個術語，而在中國則多用「方言學」，所以在中國這兩個術語往往互相混用，然而這兩個術語的意涵並不完全相同。可是儘管意涵不同，中國以「方言」來對譯英語的“dialect”並因此以「方言學」來對譯“dialectology”，又以「地理語言學」或「語言地理學」等來對譯“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和“linguistics geography”，以致造成了很多的誤解。所以我們必需先釐清 dialect 這個字的涵義，才能區別 dialect、dialectology 與 linguistics geography 的不同。

dialect 在中文裡頭，都是以「方言」對譯，然而 dialect 是由 dia-與-lect 二個字根所組成。-lect 是指語言的意思，無需多加討論，重點在 dia-這個字首。dia 起源於希臘文介系詞與副詞 dia，本義為 through, between, across (穿越、之間、之中) 的意思，另外 dialect 延伸出 dialectical (辨証的) 的字義。所以 dialect 這個字，應該沒有地理上的意涵。所以也許用「語言變體」這個詞，更能清楚表達出 dialect 這個字的含意。

由於近代歐洲語言學家對「語言變體」的認識，首先是來自於地理上的，所以 dialect 在當時，是可以與中文的「方言」對譯的。但是 dialect 可以再區分為 regional dialect (地域/地理方言) 和 social dialect (社會方言) 二大類。regional dialect 是指「語言在不同地域的變體」；social dialect 則是指「語言在社會的變體」。由此可見，dialect 絕不是專指地理上的，而是指一種語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

反觀中文「方言」這個字，「方」有方位、處所、邦國之意，所以「方言」這個詞本身是有地域(地理)含意的。因此中文「方言」這個詞就是指「各地域所擁有各俱特色的語言」，也可以這樣說，「方言」就等於是現在所說的「語言地理」。可見「方言」這詞的使用範圍是比 dialect 狹隘的，「方言」的詞義只能指稱 dialect 裡的 regional dialect 這範疇而已。但由於中文譯詞的長期使用的習慣，所以「方言」這個詞變成有廣、狹二義，廣義是與 dialect 對譯的，泛指一種語言的其他變體；狹義則是與 regional dialect 對譯的，專指擁有獨具特色的地域性語言。由此延伸來說，「方言學」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方言學是指研究各種口音和方言在空間(地域和社會)、時間上分布的語言分支學科⁴，所以可以再分為方言學(傳統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三個研究範疇；狹義的方

⁴ 見 R.L.特拉斯克編《語音學和音系學詞典》，《語音學和音系學詞典》編譯組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0)。p81，「方言學」詞條。

言學則是單指研究語言地域變體，研究此地域性語言變體的形式內容及其內部結構的學科。爲了區分二者的不同，我們往往在指稱狹義的方言學時，稱其爲「傳統方言學」⁵。

三、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

與「地理語言學」這個名稱相近並且還混用的，還有一個名詞叫做「語言地理學」（方言地理學）。「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地理語言學」是屬於語言學的範疇；而「語言地理學」⁶則是屬於地理學的範疇。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在語言，簡而言之就是根據詞的地理分布，來探索詞的歷史變化過程的一門學科⁷。而在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上，則是對一種語言（方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區域劃出分界線，並對此語言（方言）爲什麼如此分布、它在歷史上的消長爲何？提出合理的解釋。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重點在地理，將語言現象當作社會群體現象來思索，因此只涉及外在語言學的表面地帶，即方言，並視其爲全部，以便考察這些地區的社會和空間環境⁸。也就是以語言的分布或特徵，來解釋地理現象，如種族、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屬於人文地理的範疇。

雖然英文中也有 *linguistic geography* 與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兩個詞，而中文以「語言地理學」和「地理語言學」來對稱。若就從上節曹志耘（2006）的統計來看，*linguistic geography* 一詞使用的次數還遠高於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一詞的使用。但由於曹志耘做這個統計時並未區分年代，所以並無法知道這個用語是否有隨著時代不同而改變。因爲至少我們知道像 *geolinguistics* 這個詞，是較爲新興的，而現今的多爲地理語言學界所採用，例如日本的國語研究所於 2007 年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世界の言語地理學」，英文譯名便是爲：「*Geo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雖然 *linguistic geography* 中文一般都譯爲「語言地理學」，但事實上也可以譯爲「語言地理」而不是指一門學科。若將 *linguistic geography* 譯爲「語言地理」，則是指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標；而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譯爲「地理語言學」則是指研究「語言地理」的學科。一個指研究的內容，另一個是指這門學科，二者不互相衝突。而 *geolinguistics* 則是非常明確地是爲了「地理語言學」所創立的專有名詞，*geolinguistics* 這個詞的構詞法，一如 *sociolinguistics*（社會語言學）這個專有名詞的構詞法。美國社會語言學在 1950 年代剛開始產生時一般是稱爲“*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語言社會學），直到 1960 年代後 *sociolinguistics* 一詞才開

⁵ 見洪惟仁〈高屏地區的語言分布〉 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 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p31。

⁶ 此處所謂的「語言地理學」，並不是指日本慣用的「言語地理學」。日本的「言語地理學」就是本文中所稱的「地理語言學」。

⁷ 真田信治《社會語言學概論》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p89。

⁸ 羅朗·布洛東（Roland Breton）《語言地理》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5.2000）。p01。

始出現的。時至今日更是明確的將「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視為不同學科。所以由「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這個字的英文構詞概念，反過來看 geolinguistics 這個字的英文構詞，為什麼它是拼寫成“geo-linguistics”而不是拼寫成“lin-geography”或“dia-geography”，它強調是「語言學」而不是「地理學」的概念是顯而易見的。

總結以上論述，本論文將下列諸名詞定義解釋如下：

方言學 (dialectology)：泛指研究一個語言的變體的學科。所以它包含地域變體和社會變體，同時也包含地域變體和社會變體的共時和歷時的研究。其內涵可以再分為三個研究範疇：傳統方言學、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

傳統方言學：對一個方言詳細而完整的呈現出它的形式內容與結構的學問。所得的結果，往往運用在歷時的比較研究上。

地理語言學 (geolinguistic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研究詞的地理分布，來探索詞的歷史變化過程的一門學科。研究目的在把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布展示成語言地圖，進行方言分區並對此語言分布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在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上，則是對一種語言（方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區域劃出分界線，並對此語言（方言）為什麼如此分布、它歷史上的消長為何？提出合理的解釋。在歷時的研究上，則是運用各不同方言分布的情形，研判出何者為此區語言的古老形式。運用地理、種族、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與語言的關係，來解釋語言分布現象和語言變體產生的原因。所以此學科的研究目的在語言，而不在地理。

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主要研究在某一個社會中（往往是一個城市），個人或團體之間交際活動中所出現的各種語言現象及語言運用方式的一門學問⁹。研究目的則在於把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布以統計數據的方式展示成圖或表。

語言地理學 (linguistic geography)：將語言現象當作社會群體現象來思索，因此只涉及外在語言學的表面地帶，即方言，並視其為全部，以便考察這些地區的社會和空間環境。也就是以語言的分布或特徵，來解釋地理現象，如種族、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屬於人文地理的範疇。所以此學科的研究目的在地理，而不在語言。

語言地理 (linguistic geography)：泛指研究語言和地理關係的學問。它可以是以語言研究為主體，運用地理現象來解釋語言分布現象（地理語言學）；也可以是以地理為研究主體，利用語言分布現象來解釋地理現象（語言地理學、人文地理）。

第二節 地理語言學產生的歷史與背景

現代地理語言學的興起，在十九世紀中、晚期。地理語言學於此時出現，

⁹真田信治《社會語言學概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p01。

與歐洲近代語言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歐洲近代語言學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無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上都已近趨成熟，也成為當時語言學研究的主流。達爾文於 1859 年發表《物種起源》一書，構擬出地球上的物種系屬關係。德國語言學家施萊赫(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受到達爾文理論的啟發，構擬出原始印歐共同語的形式，確定了所謂「印歐語系」(Indi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親疏關係。並畫出了這個語族的譜系樹，這就是「語言譜系學」。語言譜系學的確立，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巔峰之作。至此，語言學的研究可以藉由現存可見語言，利用其語法、詞形、語音等的變化規律，找出這些語言的同源關係，然後構擬出這個語言的原始形式。把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推展到史前時代，不再侷限於文學的研究。然而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學者，雖然利用實證與經驗法則，比較多個語言，而歸納出一些語法對應與演變規律。但是難免總有一些奇怪的語音對應規律仍無法解釋，於是這些歷史比較語言學學者們只好宣稱：「所有的規律都有例外」。但是依照自然科學的原則，只要有例外，規律便不能存在。因此他們所提出的種種語言變化的規律，每每由於總有例外而引起質疑。

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已經證明，客觀世界不是雜亂無章的，任何自然現象都有自己發生的條件、起因和規律。這種新的思想方法也影響到當時的語言學家，他們認識到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之所以成為科學，正因為語言的變化是規則的。如果音變沒有規則，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有鑑於此，一群德國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學生，基於對老派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學者的不滿，於是結合成世稱為「青年語法學派」(Junggrammatiker)或「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s)的新學派。這一派青年學者提出「語音變化沒有例外」、「凡例外必有另一規則存焉」，認為如果語音變化的規律中有例外，這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規則。但是他們發現通行於都市的標準語，語音演變中總是存在一些不規則的現象，於是便推測標準語是混雜體。而遠離都市的鄉下方言，相對於都市的標準語而言，則是純粹的、單一的，忠實地保持了較古的形式。所以「青年語法學派」的支持學者，便認為這些遠離都市的鄉下方言，可以找到音位的一致規律，證明「語音變化沒有例外」的理論，因而展開了歐洲近代一系列的方言調查。

1876 年德國一位熱心支持青年語法學派的語言學者——文克爾 (Georg Wenker)，為了證實「語音變化沒有例外」的理論，開始在德國西部迪塞爾多夫城 (Düsseldorf) 周圍的萊茵 (Rhine) 地區調查方言。他向萊茵河地區的所有小學教師寄發了一份約由 300 個詞所組成的 40 個句子的調查表，請被調查者以當地所使用的方言轉寫出來。後來他擴大了他的調查區域，1881 年公布了第一批德國北部和中部的方言地圖，共有六幅。後來他放棄了這個計劃，而致力於進行整個德國語言的全面調查。文克爾得到政府的幫助，擬訂了四十個測驗語句，大都由學校教師譯成四萬以上的德語地域方言。這樣就能夠在一幅地圖上給任何一個特徵標明不同的地方差異，顯示地理上的分布。從 1926 年起，這些地圖由吳

雷德 (F.Wrede) 擔任編輯，按照縮小的比例繼續印刷出版。

雖然文克爾此調查計劃一開始的目的，是爲了尋找語音變化的規律，以證明「語音變化沒有例外」。然而事實上他的調查結果明確顯示，地方方言同古老的言語形式的關係，並不比標準語更規則一致。他驚訝地發現，同一個音變現象（例如[k]→[x]），在不同詞裡的變化情況的地理分布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反映不同詞的音變的同語線往往是不重合的（例如“maken”和“ik”這兩個詞裡的“k”的讀音的同語線就是不一致）。這種現象否定了青年語法學派「一種語音變化會以同一方式影響所有的詞」的理論。

當德國興起的青年語法學派風行語言學界的同時，同樣是德國人的語言學家舒哈特(Hugo Schuchardt)卻強烈反對音變規律的學說。他在 1866-1868 年研究羅馬方言的結果認爲方言之間並沒有一個明顯的界線，所謂「方言」的分布領域無法確定，並且認爲語言成分的混合是常態，沒有混合過的語言是不存在的，變異是語言的本質，這個理論叫做「地理變異論」。他又認爲每一個人、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甚至否定有所謂語音規律。舒哈特的學生席業隆 (Jules Gillie ron, 1856-1926) 在其思想的影響下，展開了對法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他專門訓練了一位名叫艾德蒙 (Edmond Edmont) 的調查者，以地理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法國方言的調查。花費四年時間記錄了法語區域（法國和相鄰的比利時、瑞士、義大利的邊緣地帶）的六百三十九個點（村莊），調查方式是利用 1500 至 2000 條的調查表 (questionnaire)，點與點的距離是以腳踏車一天大約所能行駛的距離爲依據，一處只調查一人。之後的語言地圖集是由席業隆設計和繪製，於 1896 至 1926 年間以《法國語言地圖集》之名出版。在這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幾乎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同語線，因而提出了「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的口號，否定青年語法學派的「語音變化沒有例外」的理論。

席業隆與艾德蒙所進行的法國方言的調查，無論在所調查的詞項上、調查點的選擇上、受訪者的選擇上都經過詳細設計，而其將調查結果編輯成語言地圖集時，對每幅語言地圖都進行解釋。這種做法，不謹在調查方法和研究方法，對後來的語言調查研究，有極深遠的影響和啓發。更重要的是對於方言學的研究目的，從作爲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素材的歷時語言學研究，轉向爲共時語言學研究。在共時的層面上，語言（方言）的比較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說「地理語言學」正式宣告確立了。

此後，歐美各國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語言地圖集，地理語言學因而日益蓬勃發展。例如：雅博爾格 (K.Jaberg) 和依德 (J.Jud) 編製的《義大利瑞士語言地圖集》(1928)；費希爾 (H.Fischer) 於 1895 年出版的施瓦本 (swabia 在德西南部，德語爲 schwaben) 地區的 28 幅語言地圖；班尼克 (V.Bennick) 和克里斯頓生 (M.Kristensen) 於 1898-1912 年編製的丹麥語言地圖；維根德 (G.Veigand) 1909 年編製的羅馬尼亞語言地圖；格里拉 (A.Griera) 於 1923 年開始編製的加塔羅尼亞 (Catalonia 在西班牙東北地區) 的語言地圖；樂路 (P.Le Roux) 從 1924 年開始編製的不列塔尼 (Brittany 法國西北部一個半島省份，北臨英吉利海峽，南臨

比斯凱灣) 語言地圖; H.Kurath 的《新英格蘭方言地圖集》(1939-1943)。在美國則開始注意到美洲印第安語, 1891 年鮑威爾 (powell) 發表了第一本印第安語言的分類集, 保愛士 (Boas) 還編輯並且參與寫作《美國印第安語大全》。並且影響美國結構語言學的布隆菲爾德學派, 特別重視口語的共時語言學, 所以在布隆菲爾德 (Lenard Bloomfield) 的名著《語言論》(Language) 中還有專章來介紹方言地理學 (語言地理學)。至廿世紀的 60 年代, 更促使社會語言學的興起。

在歐美這股地理語言學的風潮中, 有一位人物深深地影響東亞地理語言學的發展, 他就是荷蘭籍神父——賀登崧 (W.A.Grootaers, 1912-1999)。

賀登崧的父親 (Ludovic Grootaer, 1885-1956) 是席業隆 (Jules Gillieaeron) 的學生, 也是位地理語言學家, 精通荷蘭語、法語、德語和英語, 曾主持比利時、荷蘭等地的方言調查研究。賀登崧就在此家庭和學術的背景, 訓練出紮實的語言學、方言學和地理語言學, 以及人類學、民俗學的根基。他於 1932 年開始學習中文, 之後於 1939 年來中國。他真正為中國引進西方的地理語言學的觀念, 進行國土的整體語言調查研究。賀登崧於 1941 年 7 月到 1943 年 3 月以及 1948 年 7 月至 8 月間在中國所進行的語言調查研究, 率先引進以地理學上的經緯度來區隔調查區。他的研究目標, 是建設一個擺脫傳統文獻的羈絆, 以生物學和地質學 (地理學) 為樣板的歷史語言學。在這樣一個時代有如此進步的想法, 所以岩田禮說¹⁰ :

「高本漢及其著作也是現代化的一個象徵, 但高本漢卻受到賀登崧的激烈批評, 因而賀登崧研究的切入口在當時可以說是領先時代的, 儘管如此, 地理語言學的理論和賀登崧的主張在其後的漢語方言研究中, 事實上幾乎沒人理睬, 被完全抹煞了。」

要注意的是, 賀登崧雖然在當時提出領先時代的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可是賀登崧礙於那時中國的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 所以在中國幾乎並未實現過。

賀登崧於 1948 年離開中國返回比利時, 於 1950 年來日本。從 1955 年開始, 賀登崧致力於把地理語言學移植到日本。它他所主張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還延伸出日本獨創的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這種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對日本戰後的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第三節 地理語言學在日本的發展

日本的地理語言學, 發展至今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從 1894 年上田万年於歐洲學習得 G.Wenker 的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方法歸國後, 日本的地理語言學一直是與西方同步, 並深受重視。發展至後期, 甚至形成自成體系的研究調查方法。在地理語言學的成就上, 足以和西方國家並駕齊驅。

根據日本學者馬瀨良雄的〈20 世紀における日本の方言地理學研究〉一文,

¹⁰ 以下文字引自賀登崧著, 石汝杰、岩田禮譯 (2003.7), 當中岩田禮於編譯者前言所敘述。

將日本方言地理學（言語地理學）¹¹分爲四期¹²：

1、第1期（1901年—25年）日本の方言地理學研究の黎明期

1894年上田万年於歐洲學成歸國後，便極力地倡導設立國家的語言調查機構，於1902年日本文部省設立國語調查委員會。1902年國語調查委員會施行全國的調查計劃，是爲日本方言學術調查的先驅。

（1）、國語調查委員會の音韻・口語法調査とその成果

1902年國語調查委員會施行全國的調查計劃，內容爲各府縣調查音韻29個詞條和口語法調查38個詞條。調查結果由主查委員上田万年的主持下，與岡田正美、保科孝一、新村出、龜田次郎、榊原叔雄、神田城太郎共同整理完成出版：

《音韻調査報告書》〈音韻分布圖〉（彩色圖29枚）1905年。

《口語法調査報告書》2冊，〈口語法分布圖〉（彩色圖37枚）1906年。

此次的調查成果，最著名的結論是：日本全國的語言可以概分爲東西二大方言區，其語言界線大約是越中、飛驒、美濃、三河的東境。沿此四縣的東境縣界，此線以東爲東部方言；此線以西爲西部方言。

這是此次調查是日本初次的全國方言調查，因此對日本的地理語言學而言，有極重要的意義。但報告書中也指出此次調查的三大缺失：

（1）由於此次調查是以各府縣爲單位，故地點上的大小精粗並不一致。

（2）町民和舊蕃土、教育的有無、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並未注意。

（3）調查者本身語音的辨識能力、國語學的知識的欠缺，使得方言調查結果不十分理想。

（2）、第2次音韻・口語法調査とその成果の行方

日本國語調查委員會在經過第一次全國的調查計劃完成後，檢討其調查研究的缺失後，於1908年進行第2次的全國語言的調查計劃。此次共計調查音韻41個詞條和口語法調查90個詞條，仍是以府縣爲調查對象，共調查了807個地點。在岡田正美的主持下，由荒木良造和東条操進行整理。除報告書外有音韻分布圖約200幅，口語法分布圖約350幅。可惜的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這些語言分布圖、調查報告書以及個府縣寄來的調查表，全部付之一炬。

2、第2期（1926年—50年）日本の方言地理學研究の創建期

雖然第二次的音韻、口語法調查成果毀於關東大地震，但日本經過這二次的全國性調查計劃，對於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法已深植紮根。日本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進入了創建期。此期最重要的成果，在於語言地理分布的理論的建立，以及地理語言學專書的翻譯和著作。

¹¹ 日本習慣將地理語言學（或地理方言學）稱爲「言語地理學」或「方言地理學」，下文都是延用日本學者的刷法

¹² 見佐藤亮一、小林隆、大西拓一郎編《方言地理學の課題》東京 明治書院 2002。p16-51。

(1) 柳田國男《蝸牛考》刀江書院，1930 年。

柳田國男的《蝸牛考》是這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日本地理語言學的經典之作。柳田國男利用在朝日新聞社任職之便，對各方言的蝸牛一詞進行收集，並彙製〈蝸牛異稱分布圖〉。柳田氏在此調查後發現，較為古老的語言形式，往往分布在新形式的外緣周邊，新、舊語言形式成層狀分布。因而提出地理語言學的重要理論——方言周圈論。

(2) 小林好日《方言語彙學的研究》岩波書店，1950 年。

小林好日的《方言語彙學的研究》是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第一本地理語言學的專書。此時的日本國內正當社會經濟疲弊蕭條，百廢待舉，小林好日的著作，也正是地理語言學在日本重振的開始。小林氏在序言中說本書是以地理學的方法，研究語彙的成果。此書是以日本方言為素材，展現傳統方言地理學研究的專書。小林好日於 1938 年~1941 年在東北大學任教期間，以東北 6 縣師範學校・小學校為對象，進行方言通信調查。計有項目 264 條，地點數 2000 點。小林好日博覽西方方言地理學文獻，並重視方言資料和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所以此書能成為戰後日本地理語言學再興的重要著作。

(3) 東条操の方言區画

在日本國語調查委員會第二次音韻、口語法調查中，參與調查工作的東条操，於 1927 年發表「國語の方言區画」(第一次案)。他將日本語先分成內地方言和琉球方言；內地方言再區分為本州方言和九州方言；本州方言又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方言，將東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間的過渡地帶設立為中部方言，是東条操對本州方言劃分的一大特點。另外琉球方言又區分為薩南、沖繩、先島三種方言。1935 年東条操的第二次案，發表於《日本文學大詞典》的「方言」項下。第一次案將本州東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同列在一個層級位置，第二次案則是將中部方言放在低於東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一個層次的位置。

3、第 3 期（1951 年—75 年）日本方言地理學の興隆、發展期

第 3 期是日本方言地理學開花結果的時期。其中功績最大者首推淳心會神父 W.A.Grootaers (日文：グロータース；中文：賀登崧)。賀登崧於 1950 年來日本，1955 年於東京世田谷松原教會任職，於此認識了方言學者平山輝男和語言學者柴田武。平山輝男邀請賀登崧於 1956 年起講授方言地理學，受到學生熱烈歡迎，並大量投入方言調查的工作。賀登崧親自率領學生進行實地調查、資料的整理、方言地圖的作成和解釋，將歐美的方言地理學傳播到日本，也將日本的方言地理學介紹到國外。

與此同時，柴田武在國立國語研究所第一研究部地方言語研究室擔任研究室長。1955 年國立國語研究所的日本言語地圖 (LAJ) 作成準備開始進行調查，由柴田武主持，德川宗賢也參與此計劃。賀登崧也實質的加入討論。柴田武、賀登崧和德川宗賢確立了日本方言地理學的方法，促進日本方言地理學的發展。德川宗賢在柴田武從研究所離職後，持續日本言語地圖作成的工作，終於在 1975

年《日本言語地圖》全 6 卷出版完畢。

另一位足以與柴田武、德川宗賢顯赫成績相提並論的學者是藤原与一。藤原与一師從東条操，在東条操的薰陶之下，調查瀨戶內海島嶼群方言狀況。其後對中國、四國、西近畿的音韻、文法和語詞的方言地理學的調查。藤原与一所任職服務的廣島大學，因此成爲日本方言地理學研究的一大重鎮。

柴田武、德川宗賢、藤原与一三人，不論在日本方言地理學的調查工作上、研究方法上以及人材培育上，都有卓越的貢獻，因此馬瀨良雄稱他們爲「日本方言地理學構築的三先覺」。

此時期的重要方言地理學著作有：

(1) 國立國語研究所編『日本言語地圖』(LAJ)全 6 卷，大藏省印刷局，1966 年—75 年。

(2) 「系魚川言語地圖のための調査」(LAJ 調査)

(3) 柴田武『言語地理學の方法』筑摩書房，1969 年

(4) 藤原与一『瀨戶內海言語圖卷上下卷』(LAJ)東大出版會，1974 年

(5) 藤原与一『瀨戶內海方言の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東大出版會，1976 年

另外此時期的日本方言地理學的研究範疇和內涵，也進一步擴大，如：構造方言地理學、民俗方言地理學、社會方言地理學的出現與發展。同時方言地圖的繪製，也開始電腦化。

此期東条操方言區画的第 3 次案，於 1953 在《日本方言學》發表。他對日本方言的區画如下：

日本語先分成內地方言和琉球方言，琉球方言再分爲奄美、沖繩、先島三個方言。內地方言在區分爲：

東部方言：北海道方言、東北方言、關東方言、東海東山方言、八丈島方言。

西部方言：北陸方言、近畿方言、四國方言、中國方言、雲伯方言。

九州方言：豐日方言、肥筑方言、薩隅方言。

此次區画和之前二次最大的不同，在於取消了東西方言的混合的地帶。

4、第 4 期（1976 年—2000 年）日本方言地理學の收穫期

此時期日本方言地理學的發展，歸納下來有以下數個成果：

(1)、方言地理學的專題研究和概論書的刊行：

在這個時期關於方言地理學的論文和概論書籍大量出現，例如：

W.A. グロータース（1976）《日本の方言地理學》平凡社。

德川宗賢、W.A. グロータース編（1976）《方言地理學圖集》秋山書店。

德川宗賢編（1979）《日本の方言地圖》中公心書。

馬瀨良雄（1992）《言語地理學研究》櫻楓社。

德川宗賢（1993）《方言地理學の的展開》ひつじ書房。

這些都是高水準的論著，對未來日本言語地理學的向下扎根，產生極大的

作用。

(2)、方言地圖集的大量刊行和底層調查研究者的擴大：

這個時期第二個特色，是方言地圖集的大量刊行，能有如此成績，在於底層研究者的擴大，可由大學和高校的方言研究的社團大量成立可以看出。這些大學和高校的方言研究的社團，大多聘請日本言語地理學界著名的教授指導，如(括弧內為指導教授)：學習院大(德川宗賢)、椋山女學院大(真田信治、太田有多子)、金沢大學教育學部(加藤和夫)、大阪教育大(佐藤虎男)、甲南大(都染直也)、廣島大(藤原与一、高橋顯志)、梅光女學院大(岡野信子)、成德女子短大(齋藤博)、彥根東高和小倉東高(宮本登)等。

由於大學和高校的方言研究的社團大量成立，再加上有名師的指導，日本言語地理學在未來的更加興盛，是可以預期的。

(3)、社會方言地理學的發展

現今日本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潮流，是向社會方言地理學的方向展開，也就是著重方言地理學立體化的研究。

①大島一郎ほか《東京都言語地圖》東京都教育委員會，1981年

《東京都言語地圖》的作成，是由大島一郎主持，稻垣滋子、中本正智、中田敏夫、藤田勝良共同執行。分別調查老年層和青年層二個世代，調查內容計有：音韻 60、重音 110、文法 54、語彙 54 和方言意識 20，共計 298 個項目。圖集以左頁為老年層方言地圖；右頁為青年層方言地圖的方式呈現。地點數老年層 39 點，青年層 24 點。

②方言地理學の新しい展開—グロットグラム

グロットグラム是日本自行發展起來的社會語言學的調查方法。最早試用在系魚川市早川谷的調查(1969)。グロットグラムの研究方法，能將不同年代層的「平面」資料，整合成「立體」的資料。為語言史的構擬和未來變化的預測，提供可靠的依據。

(4)、コンピュータ方言地圖作成の發展

此時期的日本方言地理學還有一個重大進展，就是運用電腦來繪製方言地圖。日本開發出 GLAPS 軟體系統來繪製方言地圖，這套軟體除了可以繪製方言地圖，也可以進行社會語言學的分析。GLAPS 軟體系統的出現，宣告了日本方言地理學的電腦時代來臨。

(5)、今期を代表する 3 大研究

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代表性研究如下：

- ①大橋勝男『關東地方域方言事象分布地圖』(DAK)全 3 卷 櫻楓社，1974—76 年，同『關東地方域の方言についての方言地理學的研究』全 4 卷，櫻楓社，1989—92 年
- ②柴田武「系魚川言語地圖」上中下 3 卷，秋山書店，1988—95 年
- ③國立國語研究所編『方言文法全國地圖』(GAJ)1~4，大藏省印刷局，1989 年—2000 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成 19 年（2007）8 月 22~23 日，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舉辦「世界の言語地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 11 位國際學者發表講演。會後由岩田禮、遠藤光曉諸位學者，發起繪製「東亞語言地圖」的計畫。並於 2007 年 12 月間召開了「東亞語言地圖計畫」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暨小型研討會。確定本計畫將包含中國、日本、韓國、蒙古、臺灣、中南半島以及南洋地區。由於此區域是歷史上「漢文化區」，漢語和漢字對這地區都有相當的影響，因此本計畫的初期調查重點，是以漢字詞彙和漢字音為調查重點。目前此計畫正在積極籌備並申請經費中，預計 2009 年之後可以正式進行。

第四節 地理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地理語言學的開展，一般都上推至章太炎約於 1900 至 1901 年間所作的《檢論》卷五《方言》。書中將漢語方言分為九種，分別是：

- 1、自河朔至塞北包括直隸山東、山西及河南之彰德、衛輝、懷慶為一種。
- 2、陝西自為一種（甘肅雖略與不同但並附於此）。
- 3、河南自開封以西、汝寧、南防等處，及湖北沿江而下至鎮江，以及湖南。
- 4、福建自為一種（並含浙江之溫州、處州和台州）。
- 5、廣東自為一種。
- 6、開封而東，山東曹沂至江淮間為一種。
- 7、江南、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及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為一種。
- 8、徽州、寧國為一種（浙江之衢州、金華、嚴州及江西之廣信、饒州附此）。
- 9、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合為一種（音類湖北，湖南之沅州屬於此）。

由於章氏從未做過實地的方言調查，還未能完全做到以語言材料作為方言分區的主要依據，只是以自己的語言經驗和自然地理因素作為分類基礎。所以嚴格上說起來，章太炎並不能算是地理語言學。

對於漢語方言研究的推展最具影響的應推瑞典學者高本漢，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在比較三十三種漢語方言（其中廿四種是他自己調查的）的基礎上闡明，現代漢語方言都可以溯源到《切韻》（601）所代表的語言上去。由於高本漢利用方言調查所得的資料，在漢語歷史音韻學上得到重大成果，方言調查研究的工作在中國因而得到語言學者的重視。但此時的學者對方言的看法，只是給漢語歷史音韻學提供服務的材料，並不視方言學是一種獨立的學門。這種情形直到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陸續推動一系列的方言調查研究，才略微有改觀。但它的目的，仍在「提供歷史音韻學的比較材料」上。

1922 年出版的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4~1920）》），書中有一專節討論〈中國的語言區域和語言的發展〉，並於此節中附有一幅〈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一般認為此圖是現今所知最

早的中國漢語方言區域圖¹³。圖中把非漢語分爲土番語 (Tribal dialects)、藏語 (Tibetan)、蒙語 (Mongolian) 三大類，漢語則分爲下列五種方言：

1、官話 (Mandarin)：包含官話、客家話、杭州話、海南官話以及其他變種。另在〈中國的語言和方言〉文中，將官話再分爲「北部官話」、「南部官話」和「西部官話」三種，但在〈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中並未表示出來。

2、吳語 (Wu dialects)：包含蘇州話、上海話、寧波話、台州話、金華話、溫州和其他。

3、閩語 (Fukien dialects)：包含建陽話、建寧話、邵武話、福州話、汀州話、興化話、廈門話、海南話和其他。

4、粵語 (Cantonese)：汕頭話、客家話、三江話、廣州話和其他。

5、客家話 (Hakka)¹⁴。

在〈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另一個特點，是在語言之間和方言之間有著混雜分布的過渡區。

《中華歸主》並未交待書中將漢語方言分類的標準爲何？但其分類受歐洲當時風行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以語言譜系樹的觀點，對漢語方言做層次性的分類與歸類。〈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中所呈現的大方言的分布範圍，大體上也接近實際語言分布的事實。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中華歸主》所以依據的資料，應是來自傳教士於中國內地傳教，所對漢語方言進行的瞭解。

在〈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中另一個特點，是在語言之間和方言之間有著混雜分布的過渡區。例如在遼寧、熱河、綏遠等省，官話與蒙語接觸地區，畫有混雜分布的地區；在甘肅西南部和四川西北部交界處，有官話與藏語的混雜區；在青海省內則有蒙語和藏語的混雜區；在浙江省西部有吳語和官話、閩語和官話的混雜地區；安徽省東南部有吳語和官話的混雜區；江西省東南部、南部分別有閩語和官話、客家話和官話的混雜區；湖南、貴州、四川和廣西北部有粵語和官話的混雜區；雲南省內則也有粵語和官話的混雜區。在語言和語言接觸地區產生語言混雜的語言過渡區，是語言地理分布的實際現象。這些語言混雜地區有可能是雙語並存，也有可能是語言混合，這在書中並未詳細說明。不過就在中國語言區的劃分上，〈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在當時的條件來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到近代中國，最值得注意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是在 1988 年由香港朗文出版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合作進行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利用歷年來中國所進行的方言（語言）調查的結果，共繪製了三十六幅彩色地圖，每幅圖並附文字說明（如圖 2-4-1）。由於中國國土廣大，語言地圖的繪製完成，誠屬不易，所以《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完成，不可不說是中國語言學界的一大成就。

¹³ 見游汝杰《漢語方言學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p232。

¹⁴ 《中華歸主》的編者對客家話的歸類很特殊，一方面歸入官話，另一方面又歸入粵語。因爲編者認爲客家話是以古官話爲主並混合了廣東話成份的方言。所以在書內專章〈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中，既歸入官話，又歸入粵語所以漢語方言只有四大類。但在〈中國語言區域分劃圖〉中，又將客家話獨立出來，漢語方言又成爲五大類。這種情形也許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編者因爲資料來源不同，不同資料對客家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才產生這種混亂的情形。

然而就其方法上卻有所缺憾，因為其調查點的選擇上仍採用以現有的行政區域為調查點（最細到縣級），無法跳脫人為行政區域的窠臼。就細部而言，圖集中所繪製的方言界線，只是一個粗略的情形。與日本、美國等語言地理學家利用經緯度來分區，進行的國家各地語言的調查研究相較¹⁵。《中國語言地圖集》就顯得較為粗略，沒有整體的規劃性。甚至可以說，其調查方法和調查工作的規劃上尚不如四十年前的賀登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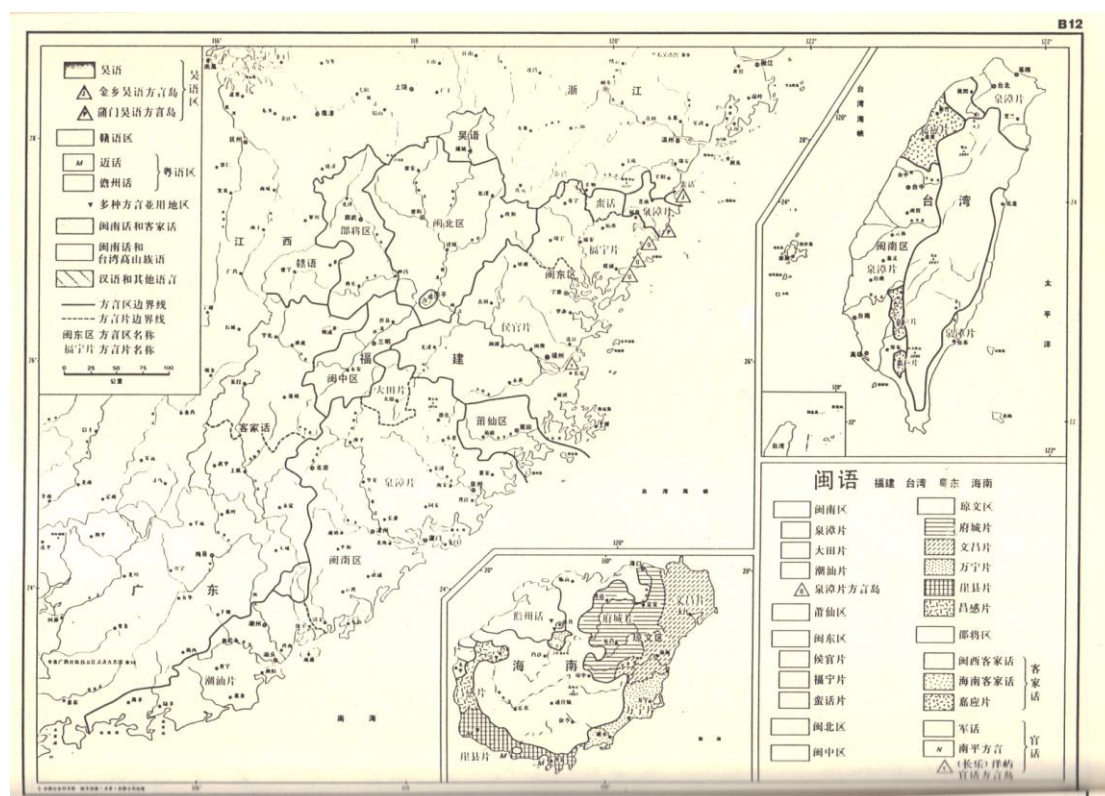


圖 2-4-1、《中國語言地圖集》B12 閩語區

大體而言，傳統的中國地理語言學主要研究的重點，是放在漢語方言的分區研究上；討論重點多在各方言要如何劃分、如何歸類以及各方言的分布範圍上。而且這種研究的基礎理論，仍不脫語言譜系樹的思維。而在方言分布上，往往仍在討論方言界線的問題，所繪製的語言分布大多是語言分布的區塊圖。如果是點圖，大多也只是為了呈現方言分布地點，而不是就此語言地理分布的現象進行分析，提出解釋。

但是近年來中國地理語言學有長足的進步，如郭鳳嵐（2007）《宣化方言及其時空變異研究》。她一方面襲用賀登嵩和王輔世的地理語言學的調查，另一方面又利用王輔世（1950）《宣化方言地圖》的資料，進行真實時間的語言比較研究。同時又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概念，在每個調查地點都分別選擇一個老年人和一個

¹⁵ 如德川宗賢所編《方言地理學圖集》(1976)；Lee Pederson, 所主編的 *Linguistic Atlas of the Gulf States* (1986)。

名少年，進行共時的老年層跟少年層的語言比較研究¹⁶。最後並將方言分布和自然、人文地理以及居民的一切社會活動連結起來進行研究，所以這是一部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地理語言學著作。

另外對於中國的地理語言學，日本學者也有傑出的研究。這裡我們將介紹橋本萬太郎的《語言地理類型學》，以及岩田禮的《中國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學的研究》的研究計劃。

1、橋本萬太郎的（1978、1985）《語言地理類型學》，是一本宏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本書的主旨在根據亞洲語言現象，為現代語言學開闢新的途徑。並以此提供線索，揭示矛盾。他運用語言類型學（typology）的觀點，顯示出亞洲大陸在語言結構類型方面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例如他以名詞句結構，將漢語方言區分為北方型和南方型二種：

北方語	吳語	閩語	客家話	粵語
客人	人客	人客	人客	人客
公雞	雞公	雞公	雞公	雞公
公牛	雄牛	牛公	牛公/牛牯	牛公

這種後置修飾語的複合詞，越往北越少。至長江流域的方言，就出現了南北分線，南方型和北方型的詞序突然共現於同一方言之中：

溫州	溫嶺	至德	歙縣	南昌	常州
草雞/雞媛	—	公雞/雞公	雞母/姆雞	雞公/樣雞	雌雞/雞婆
雄豬/豬牯	公豬/豬雄	—	—	—	—
雄牛/牛牯	—	—	—	牛牯/公牛	—

貴州·銅仁	貴州·思南	貴州·鳳岡	貴州·湄潭	貴州·習水
公雞/雞公	雄雞/雞公	叫雞/雞公	叫雞/雞公	叫雞/雞公
母雞/雞母	母雞/雞母	—	—	—

這條南北分界線，在安徽省恰恰處於長江沿岸。例如，自西向東串連岳西→潛山→東流→懷寧→貴池→石埭→銅陵→南陵→宣城→寧國各縣以北是「公雞」。跟這些縣相對的，同樣自西向東串連宿松→太湖→望江→至德→青陽→太平→涇縣等縣以南都是雞公。

雖然橋本萬太郎是放眼整個亞洲的語言現象，不是專門針對漢語方言進行研究。但由於中國是東亞大國，所以許多語言現象都與漢語有關。所以除了此書是一本重要的地理語言類型學的論著外，也可視為是中國地理語言學一本重要著作。此書在中國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有二個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1）、開創以語言類型學的角度，來進行漢語方言的研究。

¹⁶ 岩田禮在本書的序中說到：「就每個調查地點分別選擇一名老年人和一名少年，據管見（作者按：指在中國大陸地區）是沒有先例的。」

(2)、對漢語方言的研究的視野，從中國境內擴展至東亞甚至整個亞洲。

將漢語方言放在與亞洲所有語言同等的地位來研究，宏觀的觀察東亞整體的語言地理的情況。這種研究才能將清楚看到語言分布的連續性和語言變異、變化的全貌。

2、日本漢語學者岩田禮等的(1989~)《漢語諸方言の總合的研究——漢語方言地圖集》。這是日本漢語學者岩田禮自平成元年(1989)起，申請文部省科研經費所進行的一系列漢語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之後由平田昌司、遠藤光曉、太田齋三位學者分別組織科研，每一期都以報告書的形式出版了地圖集。目前發表了38項目的地圖，方言點數超過300點。方言點的資料來源，除了自行調查外，也採用一些已發表的調查報告，如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1992)、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言調查報告》(1992)、侯精一、溫瑞政《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1993)以及新編地方志(縣志)中的語言志等。

岩田禮根據語言地圖所顯示，將中國漢語方言的分布，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¹⁷：

(1)、南北對立型：例如：下雨(下/落)；外祖父(爺/爹/公(語幹))；胳膊(胳膊/手(第一成份))。

南北對立型，是漢語方言最重要的二分類型。這條界線，概約在長江(長江線)、淮河(淮河線)一帶¹⁸。就方言區畫的觀點來說，長江線是官話方言分布的南界，而淮河線是官話方言內部二分的界線(淮河以北是北方官話，淮河以南是南方官話)。

(2)、長江型：例如：祖父(「爹」的分布地域(語幹))；胳膊(「膀」(的分布地域(語幹))；雹(「冰」、「雪」的分布地域)。

長江型是指江淮線和長江線的中間地帶，獨特的方言分布類型，但不含長江中、上游地區。O.Zavjalova(1983)稱此地區的方言為Southern Guanhua(南方官話)，淮河線以北稱為Northern Guanhua(北方官話)。

(3)、楚語型：例如：外祖父(家的分布地域(第一成份))；外祖母(家的分布地域(語形全體))；膝蓋(p-l、p系的分布地域(最終成份))。

楚語型和長江型類似，但不包含江蘇省。主要分布地域是以湖北省為中心，東至安徽省，西至四川省，北至河南省、陝西省南部，南至江西省、湖南省北部地區。

(4)、東西對立型(沿岸：內陸)：例如：膝蓋(「膝」的有無(語幹))；膝蓋(語構成的類型)；外祖父(老/外(第一成份))。

東西對立型是中國大陸全國東西類型二分的等語線，也表示著沿岸地區和內陸地區的方言特徵的差別。在淮河線以北的地區，山東省和河北省周邊有共通的語形，與山西省以西形成對立。在長江線以南的地區，浙江省和福建省周邊有共

¹⁷ 參見岩田禮《漢語方言地圖集》〈漢語方言に於ける地域差と分布の型——方言分布の靜態と動態〉(1997)。p2。

¹⁸ 這條界線由安徽省往西則較不明確，概約是在河南南部以及湖北，四川則受限於資料較少所以尚不清楚。

通的語形，與江西省和廣東省以西形成對立。

(5)、周圈分布：例如：外祖母（老娘/姥姥）；膝蓋（k-l-p 系/p-l-k 系）。

所謂周圈分布是指不同語形以同心圓方式分布，以中國北方地域為例，周圈分布的外側為語形的古老形式，中心地區所分布的是新的語形形式。

(6)、遠隔分布（ABA 分布）：例如：雹（雹/冷（語幹的第一部份））；胳膊（膊/膀（最終成份的語幹））。

遠隔分布是指一種語形被其他語形所隔離，而不成成片的分布。與周圈分布的差別，在於周圈分布有新舊語形的替代關係（語形間有相似性）。而遠隔分布則是無新舊語形的替代關係，或是無法判定新舊語形（語形間無相似性），故又稱為 ABA 分布。

(7)、北方方言江東侵入型：例如：腳（腿/腳、骹（語幹））；兒子（兒/崽，囡（語幹））。淮河—長江線的漢語方言南北二分的語言界線，在歷史上應是起源於古代的國境界線。但有些語形卻有越界南下的情形，這就是北方的語形越過長江線侵入江東地域的類型。

岩田禮等日本學者此系列的漢語地理語言學研究，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靜態上，指出主要語言類型在廣域的分布情形，顯示漢語方言地域差異的存在。二是在動態上，基於語言的地理分布推測漢語的語言史，以及顯示語言傳播和擴散關係的模型。其研究成果對中國地理語言學上的研究，有下列幾點重要性：

- (1) 以詞彙做為調查研究的對象。
- (2) 以語素作為分類的標準。
- (3) 繪製的語言地圖是點狀圖。
- (4) 為首見的利用 GIS 系統所繪製的中國大陸語言地圖。

在 2001 年間，中國北京語言大學研究所的曹志耘教授提出《漢語方言地圖集》的研究計劃。此計劃最大特色，是仿效日本岩田禮等學者《漢語方言地圖(稿)》的語言地圖呈現方式，繪製「方言特徵圖」，有別於《中國語言地圖集》「方言區塊圖」的方式。

此計劃由 2001 年開始執行調查，至 2006 年完成最後一個調查點的記錄，共計調查了 930 個調查點。調查條目是使用專門編寫的《漢語方言地圖集調查手冊》，內含單字 425 個、詞彙 14 類 470 條、語法 65 類 110 條，共計 1005 個條目。調查結果輸入電腦，利用電腦繪製方言地圖。

最後根據調查結果，從全部調查條目中歸納出最有價值的 522 個地圖條目，繪製方言特徵分布地圖。方言地圖分為語音、詞彙、語法 3 卷。其中語音卷 2 冊共 208 幅方言地圖，詞彙卷 2 冊共 208 幅方言地圖，語法卷 1 冊共 106 幅方言地圖¹⁹。

各表地圖類型與數目統計如下：

語音卷 208	音類圖	規律圖 23
---------	-----	--------

¹⁹ 《漢語方言地圖集》全書作者未見，本文的內容與例圖，是根據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簡介》《日本兩國の方言の過去、現在、未來》金沢大學文學部（2007）。p2-10。

		代表字圖 128
	特字圖 33 音值圖 24	
詞匯卷 208	概念圖 192 詞形圖 6 分合圖 6 綜合圖 4	
語法卷 106	結構圖 55 語法詞圖 39 綜合圖 12	普通話出條圖 31 方言出條圖 24

所分各類型圖的作用如下：

1、語音圖以反映重要的歷史演變為主要目的，同時也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音類圖反映音類的古今演變情況，包括「規律圖」和「代表音類圖」兩類。規律圖反映音類的古今演變規律，即某個音類保留、分化、合併、變化的類型和條例。特字圖的「特字」，是指從讀音的來源或演變的角度來看比較特殊的字。音值圖是選擇部份比較有代表性的、比較重要的音值，以反映漢語方言在音值方面的特點。

2、詞匯圖以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為主要目的，有些圖也可以反映歷史演變的情況。概念圖反映一個概念在各地方言中的具體說法，詞匯圖中有 92% 是概念圖。詞形圖，反映一個詞形在各地方言中的意義。分合圖反映在各地方言中，不同概念是否使用同一個詞形。綜合圖是對現有材料進行進一步綜合、分析後繪製的圖。

3、語法圖以反映重要的地域差異為主要目的，有些圖也可以反映歷史演變的情況。結構圖反映某個語法結構在各地方言中的相應形式，包括「普通話出條圖」和「方言出條圖」²⁰兩類。語法詞圖，「語法詞」是指語法屬性比較強的詞，主要是代詞、副詞和虛詞等。綜合圖反映在構詞或語法功能表達方面的一些綜合性現象。

圖 2-4-2 是詞匯卷第 068 圖「“手”和“腳”的詞義」：

²⁰ 因為有些語法現象只見於方言，在普通話裡沒有對應的形式，所以從方言角度專設圖目，稱為「方言出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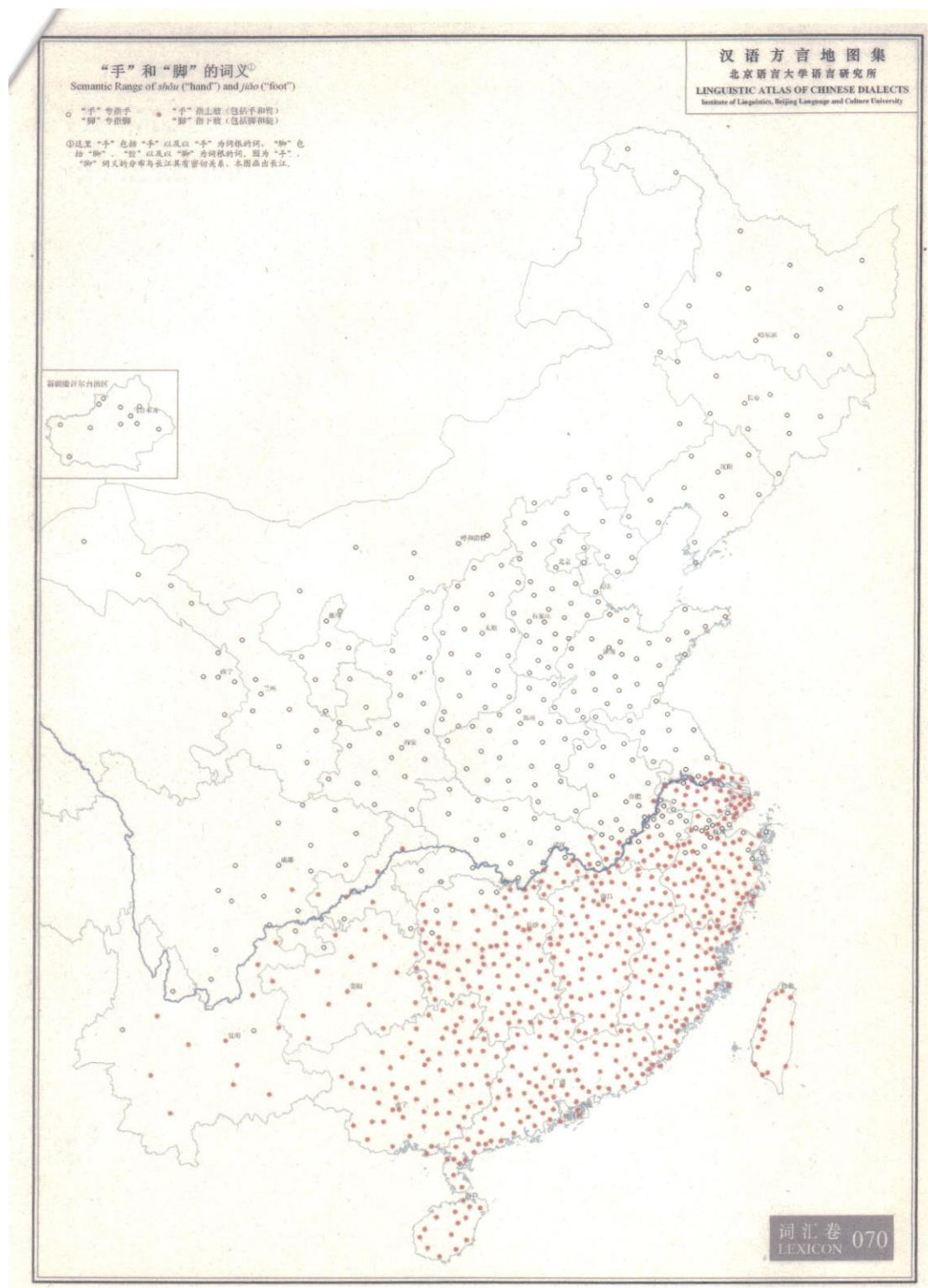


圖 2-4-2、《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 070 「手和腳的詞義」

《漢語方言地圖集》是第一部全中國的方言特徵分布圖集，在中國的地理語言學的發展上，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就其內容來說，語音、詞匯和語法都能注重，歷時與共時的現象也都能兼顧。能夠跳脫中國傳統方言學，只是為歷史語言學服務的窠臼。這些都是這本地圖集不可抹滅的優點。

本地圖集尚可改進加強之處，概約有三點：

1、對於調查點的選擇以縣級為單位，仍受限於行政區域的框架。在地圖集的前言中也提到，近幾十年來中國中國縣級行政區劃變動很大，而明清時代的府縣與漢語方言分布具有密切關係，因此，在東南方言地區，如遇晚近發生的撤縣或設縣的情況，設點一般以清代的行政區劃為準²¹。事實上，這個說明有其矛盾之處。因為地理語言學的一個研究範疇，就是證明方言分布與人文地理之間的關係。所以依此作法來設點，是已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所以正確的設點方式，應該是仿效在 1940 年代間荷蘭籍神父賀登崧 (W.A.Grotaers)；或是日本 1955 年國立國語研究所的『日本言語地圖』(LAJ)計畫的方式，利用經緯度來劃分調查區域，以此減低行政區域變動所帶來的困擾。

2、調查點的選擇以縣級為單位，縣級以下的語言分歧現象多被忽略。雖然在計畫中對於一個縣裡有兩種區屬不同而且勢力相當或都很重要的方言，會分別設點，但這仍然明顯不足。如在臺灣的部份，雖然每縣均設有一個調查點，但在桃園、新竹地區，完全無法表現出方言分布的實際狀況。

3、東南方言地區原則上每個縣設一個點，官話和晉語地區約每 3—4 個縣設一個點。這使得語言地圖明顯地東南細密，北方疏略。這種安排，是基於作者認為官話區的一致性高。然而就地理語言學的觀點來說，在地理上能平均布點、才能觀查出方言在不同地域間的細微變化。

第五節 地理語言學在臺灣的發展

本小節將針對在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上，極富代表性與時代意義的語言地圖，分為：日治時期、戰後和現今等三部分作深入的檢討。劃分為這三時期的依據，「日治時期」與「戰後」是以 1945 年為分界，「戰後」與「現今」兩個階段的分界，則大約以洪惟仁 (1990) 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為分界。以此劃分的原因，是由於洪惟仁是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上產量最豐、影響最大的人物，並且現今從事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啟發。另外洪惟仁在臺灣語言地圖的繪製上，也帶動了採用 GIS 來製圖的風潮。這些對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發展來說，都是具有創時代的意義。因此本文就以洪惟仁 (1990) 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繪製的年代，作為「戰後」與「現今」兩個階段的分界²²。

另外每一時期地理語言學成果的介紹，是按照討論目標分為宏觀（全省）、中觀（縣級）、微觀（鄉鎮級以下）的研究次序來排列。以彰顯每一時期，不同研究方向的成果。

²¹ 參見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 年。p2。

²² 更明確的說，應該說這個分界是以 1990 年為上限，2000 年為下限。

一、日治時期

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圖一)

就地理語言學來說，研究臺灣語言地理的開山始祖，首推小川尚義（1907）在《日臺大辭典》卷首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圖中詳細繪出漳、泉、客各方言，在臺灣的分布情形。此圖究竟依據什麼資料繪製而成，現在已無法得知，或許是經由粗略調查並參考籍貫分布圖所製成²³。拿此圖與今日對臺灣調查的研究成果來比較，仍多相符。可見此圖展現出當時臺灣語言的分布實況，可信度是相當高的。時至今日，在進行臺灣的語言地理調查時，仍多以此圖作為參考依據，或做方言消長的對比依據，它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此圖為彩色地圖，並且標示出經緯度、縮尺比例。就地圖的製圖來說，這是一張標準的「普通地圖」。在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來看，此圖是張語言地圖。但若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此圖不折不扣是張屬於「人文地理」的語言分布圖。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1935)(圖二)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中的附圖〈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是近代最早出現最為詳盡的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分布地圖。圖中列出泰雅(Atayal)、賽德克(Seedeq)、賽夏(Saisiyat)、布農(Bunun)、鄒(Tsou)、卡那卡那霧(Kanakanavu)、沙阿魯阿(Saaroa)、魯凱(Rukai)、排灣(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s)、雅美(Yami)共十二種(清代所謂的「生番」)；噶瑪蘭(Kavalan)、巴宰(Pazeh)、邵(Sao)共三種(清代所謂的「化番」)；凱達格蘭(Ketagalan)、道卡斯(Taokas)、巴布拉(Papora)、貓霧(Babuza)、胡安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共六種(清代所謂的「熟番」(平埔族))，等 21 個原住民語言。前十二種原住民的分布區(「生番」區)以土黃色標示，和漢民族分布區(白色)區別。最值得一提的是，這幅語言分布圖是以「方言特徵圖」的方式繪製。此圖應是臺灣第一幅「方言特徵圖」，不但為臺灣原住民語的分布保存了珍貴的資料，在研究臺灣原住民的部落分布上，也相當有參考價值。

二、戰後

吳守禮(1954)《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圖三)

吳守禮先生的「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自述是轉載日本明治四十年《日臺大辭典附錄》，所以此圖即是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不同的是，小川尚義的原圖是彩色圖，是以不同色塊區

²³ 參見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 前衛出版社(1992)。p31。

分不同語言和方言。而吳守禮先生的「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則爲了配合黑白印刷，所以改以網格區分不同語言和方言。

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圖四）

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是鍾露昇利用在師大、輔大任教的三年期間，對此二校學生進行的語言調查，並於 1967 年撰寫而成的研究報告。這些學生年齡約 18 至 31 歲不等，大部份是 19 至 26 歲之間，共調查人數 448 人，174 個調查點，問卷字表的語彙僅 27 個。依照此資料，論文中列出語音種類、分詞、分區統計各種口音的使用人數及百分比，並分詞繪製出「各縣市代表語音」、「各地區代表語音」的二種方言地圖。這是臺灣地區真正透過語言調查，而繪製語言分布地圖的發端，也是戰後臺灣的第一幅方言特徵圖。但由於調查點分布不均，故無法劃出明顯的等語線。舉例來說，在鍾氏的地圖上，北臺灣地區（臺北縣、市、及基隆市）除基隆市（以行政區隔開）外，都劃歸泉音區，這與實際狀況是完全不相符的。

整體說來，鍾露昇的地理語言學的觀念是進步的，例如他說（1967.p10）：

「在臺灣省內漳泉雜居，又因交通方便，時常遷徙，因此各地方言很難截然劃分區域性。以縣市為單位，顯然不夠；因此我們以區、鄉、鎮為調查點，可以作得精細些。」

又如（p12）：

「臺灣的閩南語分布，有些語詞很難截然分區域，採用點制畫法，可以作的更精細。」

這種注重調查點數量要多、以鄉、鎮為調查點的調查，正是地理語言學調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在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之後，能再次重視調查點數量要多、以鄉、鎮為調查點的調查，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後，洪惟仁先生的調查研究了。

不過在當時仍是以傳統方言學為主流的時代，鍾露昇不能免俗的也提出所謂的「代表性語音」。

「各區、鄉、鎮為一調查點，選出代表語音。同一地區內部有不同的，以多數為代表。」

甚至連各縣市也以統計使用人數的多寡，選出各縣市的代表音。就今日的研究觀點來看，掩蓋了各鄉鎮區的差異，反而更無法精準地繪製出各個方言區。

不過無論如何，鍾露昇首開在臺灣以地理語言學的觀點來進行調查研究，此學術成果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洪惟仁先生讚譽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實在是台灣漢語地裡語言學的開山之作²⁴。

丁邦新（1980）《臺灣語言源流》----「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圖五）

²⁴洪惟仁在其博士論文（2003.6）本文前〈感謝的話〉中提到：「鍾老師（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1967）是台灣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對我後來的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有深刻的影響。」

在丁邦新的《臺灣語言源流》一書的第七頁中，附有一張「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此圖據書中所述，是根據手邊的材料，就其大者而言，約略繪成，作為參考。並說參考了《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氏族篇及語言篇（1960），及臺灣各縣市志稿人民志，人口篇或語言篇等。

這張語言地圖主要是以縣為單位，僅分出 1. 泉音盛於漳音；2. 漳音盛於泉音；3. 泉音與漳音相當，這三種情況。就其所繪製的語言地圖來看，準確性不高，更別說細部的區別了。尤其以人民的籍貫為依據，來判別語言的不同，並以此認定是通行泉音或漳音，更是失了準確性。與小川尚義的語言地圖相比較，此圖大大的退步，準確度、細緻度和美觀上都大大不如。在方法上，則是不如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

洪惟仁：（1990~）〈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圖六）

洪惟仁以十餘年的時間，對臺灣進行方言調查，為現今對臺灣全島漢語方言進行調查研究最久且最投入的一人。於 1989 至 1997 年間在中央研究院龔煌城院士的主持下，陸續發表臺灣北、中北、中、南（高雄部份）、南、東（含屏東和澎湖）等六冊調查報告。並繪製〈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1990，2002，2003 修訂）（圖六-1），此圖是現今唯一能與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相媲美的臺灣全島漢語方言地圖。更令人敬佩的是，洪惟仁對語言調查的執著，至今仍然熱衷於語言調查的工作，並將最新調查的結果對此圖進行修正。所以此圖從 1990 年初繪，至今（2008）（圖六-2）已經過至少五次以上的修訂。

洪惟仁的這張〈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1990），是在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發表 20 年之後出現的全臺灣的語言分布圖。與鍾氏的地圖相比，洪惟仁更注重地圖的整體的美觀性跟標示的清晰性，因此採用彩色印刷。但鍾氏所使用的「點制畫法」（方言特徵圖），洪惟仁並未採用。而是採用與小川尚義相同的語言區塊圖的方式，並於圖中註明一些重要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方言點地名。一如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就展現臺灣整體的分布而言，此圖能讓人一目瞭然。但在細部的觀察上，這種語言地圖並無法明確的標定出語言（方言）間交界的位置，以及這一種語言（方言）明確的分布區域。

顧百里（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圖七）

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在澎湖閩南話的研究，以及臺灣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是相當重要的一本學術論文。在澎湖縣閩南話的分布和特點上，他認為：²⁵

「所調查的八十八種澎湖方言實在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各地的語音系統都非常類似。在本調、聲母和絕大部份的詞彙上，各種方言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為了方言比較的目的，我們在本章裡自然會強調各種方言的不同之處；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八十八種方言的基本一體性。」

²⁵ 見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78）。p111。

又說：

「本文中所描寫的各種方言相差最大的地方是在變調、韻母和一小部分的詞彙上。」

所以顧百里選擇了八個條件，來作為澎湖方言分類的依據：

1. 上聲之變調。
2. 陰去聲之變調。
3. 帶喉塞音韻尾陰入聲之變調。
4. 「好、廟、落、藥」等字之韻母。
5. 「雨、布、路、虎、姑」等字之韻母。
6. 「汝、瓦、銀」等字之韻母。
7. 「洗、狹、(找)、月」等字之韻母。
8. 特字和詞彙。

依此標準，繪製了十二幅方言地圖，其中第一幅至第十一幅為單一特徵項的「方言特徵圖」，第十二幅則為「澎湖方言綜合地圖」(方言區劃圖)。並將澎湖閩南話劃分為二個大方言區，第一區的涵蓋範圍，大約就是白沙鄉全境；第二區的涵蓋範圍，則為除白沙鄉以外的其他地區。其中第一區不再劃分次區，而第二區則還細分為五個次區。將澎湖閩南話劃分為二個大方言區，顧百里所依據的標準，事實上就是「偏漳腔」與「偏泉腔」之別。

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是臺灣第一部專門以地理語言學為研究目的的學位論文，所以本書的價值不言而喻，但是本書有一個重大缺點，就是未對發音人的年齡當做抽樣變因進行控制。顧百里所選擇的發音人，小至國中、小學生(約 12、13 歲)，老至約 60 歲，並未顧及年齡差異對語言變化的影響。以此作為一個村的代表，這將會產生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使人對於所做的方言比較結果產生質疑。

但是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是臺灣地區第一部以地理語言學為研究目的的學位論文。所以在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有其劃時代的意義。這些地圖是採用網格區塊圖來呈現，黑白印刷。因為採用區塊圖來呈現，再加上是由徒手描繪，所以方言區之間的確實分界位置不明確。另外在整體的觀感上，也有欠美觀。不過以當時的條件來說，已經難能可貴了。

潘科元(1997)《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圖八)

潘科元的《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是他在清華大學語言所的碩士論文。此論文是繼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之後，另一部出色的地理語言學的學位論文。作者利用大台北地區 28 個方言點的方言資料，進行了類型比較方言學與地理語言學的研究。與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相比較，雖然調查點跟調查人數較少。但在發音人的選擇上則控制在以世居當地，本人在當地成長營生，不常待在外地，60 歲以上，以閩南語為生活語言的老年人為對象。範疇化的控制，使得在進行方言比較時更具可靠性與精確性。

文中他所用來比較的閩南語類型變項計有：聲母 1 類；韻母 26 類；聲調 5 類，這些變項都是臺灣閩南語各次方言間最顯著的差異性類型特徵。根據所分析的變體類型及方言調查結果，將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為泉州腔、漳州腔、漳泉混合腔三種；泉州腔之下再細分為老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等；漳州腔之下再分老漳腔、新漳腔。並根據調查資料繪製了「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布圖（老年層）」的語言地圖。此圖是黑白描線圖並配合不同的點符號來區別不同方言，所以整體說來有失於清晰和精準，所以此圖只展現了一個方言界線和方言分布的概略情況。

李仲民（1998）《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圖九）

《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為筆者的碩士論文，此論文為臺灣地區第一部以鄉級為調查對象的學位論文。選擇鄉級作為調查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於筆者有鑑於臺灣的方言調查工作，調查點的選擇大多不平均，有許多偏遠地區從無人從事調查研究。也因此對於語言分布的詳情，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若有志於從事方言調查的學生，均能由自己的家鄉調查起。如此長此以往，便可累積相當可觀的鄉鎮語料。對整體的臺灣全島的漢語方言研究，將有實質的幫助。另一方面，由於雙溪鄉幅員廣大，為臺北縣第四大鄉鎮，且正位於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東面交界之處。因此對雙溪鄉進行方言調查，將有助於釐清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方言界線。由於是鄉級的調查研究，所以筆者便將全鄉概分為北、中、南、東、西五個區塊進行調查。經由實地調查研究結果，繪製了十九幅方言分布地圖。本調查研究發現並非雙溪全境均通行漳州音，在其西部盤山坑一帶已是通行泉州音。因此臺灣北部泉州音與漳州音的東面語言界線，若僅依行政區的界限來劃分，是不正確的。所以洪惟仁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布圖〉對此處的語言界線，也依此於 2003 年修正。

本圖是以徒手描繪而成，以不同網格來區分不同方言區，黑白印刷。主體是區塊圖，但再配合上調查點以及方言分界點處，以點制畫法標註。此圖以現今的標準來看，已嫌粗糙，但在臺灣的閩南語語言地圖史上，這是第一張以鄉為調查範圍繪製的語言地圖。

三、現今

卜溫仁（1993~1999、2008）《臺灣語言學圖集》（圖十）

這是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卜溫仁，自 1993 年至 1999 年期間所執行的國科會計畫。所用的字表都是選用一些常用詞彙，並經過六次修訂，分成 13 類共計有 325 個詞項。由於卜溫仁的記音採用嚴式音標的印象式記音（*impressive transcription*）方式，聽到什麼記什麼，他把所記的音值直接展示在地圖上，所以地圖上所顯示的變體很複雜，難以繪出同語線。卜溫仁《臺灣語言學圖集》最大的特色：一是它是有史以來臺灣漢語方言調查人數最多的一人（超過 1000 人），

二是第一個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繪製臺灣語言地圖的人。

卜溫仁的語言地圖是方言特徵圖的形式，但因為採用嚴式音標的印象式記音，所以每個詞項的變體都很繁多，所以看起來過於雜亂，無法一目了然。另外在它 2007 所發表的〈Mapping Taiwanese ‘bat (chiropteran)’〉中，地圖的底圖已由單一黑白的縣級行政區域圖，再加上一個彩色的臺灣語言分布的圖層，此圖層看其特徵，應是參考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而來。這個做法也許是為彌補無法繪出同語線和以所得的資料進行方言分區的問題²⁶。

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圖十一）

張屏生是繼洪惟仁之後，致力於臺灣閩南語、客語調查研究，最出色的學者之一²⁷。張屏生所從事的方言研究，最主要的是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研究，尋找出臺灣地區各角落特殊的變體；所以在發掘臺灣閩南語的各種不同類型上，功不可沒。

在張屏生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一書中的第一冊，書末附有一張「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的彩色語言地圖。若說此圖是張屏生這些年來對臺灣閩、客語調查研究的總結，並不為過。雖然張屏生調查研究的工作是從傳統方言學的角度切入，但經過長期語言資料的累積，由點而成面，因此能提出臺灣閩、客語分區的條件。故將臺灣閩南語細分為九片（偏泉片、泉州腔新竹小片、泉州腔鹿港小片、安溪片、同安片、惠安片、新泉州片、偏漳片、漳泉混合片（通行腔）²⁸），就臺灣閩南語類型的區分上，是較洪惟仁的區分更為精細。另外此圖與洪惟仁的地圖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此圖行政區域均有標示出來（到鄉鎮市級），所以只要觀覽此圖，對於各方言的分布地點便可以輕易掌握，很適合初接觸臺灣閩南語研究的學生或是非專業人使用。

由於此圖的重點在臺灣全域，最細密處僅達鄉鎮級，所以較難突顯鄉鎮級以下不同方言的分布，這是此圖未臻完善之處。

洪惟仁（2004）〈高屏地區的語言分布〉（圖十二）

本文在討論高屏地區的語言分布做一個詳細的描述²⁹，並繪製語言分布圖。另外並從語言社會學及語言地理學的觀點，對語言分布的事實進行解釋。文末附有六張此地區的語言分布圖（彩色圖）³⁰。

由於片狀的語言地圖幾乎是不可避免地以偏概全，以強代弱的現象。語言調查者不可能進行全民普查，因此所繪製的片狀分布圖，自然會以點概面。經由洪惟仁先生對此地區進行語言調查之後，再與小川尚義（1907）以來的語言地圖

²⁶ 此調查結果已於 2008 年由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出版，書名《Mapping Taiwanese》。

²⁷ 若以近年來臺灣的方言調查的質與量來說，張屏生教授堪稱臺灣少壯學者的第一人。

²⁸ 這個分類標準，請參見張屏生（200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第十章〈台灣地區的漢語方言分布〉p386-393。

²⁹ 此次調查的重點在六堆客家、滇緬義胞、大陳義胞及原住民的實際分布。

³⁰ 此六張圖分別為：「高雄縣美濃以北地區語言分布圖」、「屏東北部語言分布圖」、「屏東中部語言分布圖」、「佳冬新埤周邊地區語言分布圖」、「恆春半島語言分布圖」以及「高屏語言分布全圖」。

相較，得到以下的差異：

1)在小川尙義(1907)的〈臺灣語言分布圖〉中，所有的客語區都緊臨南島語區，但我們的地圖兩者之間是一條長條連續的閩南語區，這個地區主要是平埔族的分布區。……我們無法想像現在講閩南語的平埔族在日治時代是講客語的。

2)小川尙義(1907)在恆春、車城還標示著相當大的客語分布區，但是現在客家人已經閩南化，這些地區都已變成閩南語分布區了。

3)小川尙義(1907)在高屏地區還明顯地標示漳泉方言的分布區，但現在漳泉幾乎已經完全融合，只有高雄海邊林園鄉紅毛港還保存了一點淡薄的泉腔味道。唯一可以算是泉腔方言的只有小琉球。除此之外，整個高屏地區都被我們劃入閩南語混合腔區。

4)小川尙義、淺井惠倫(1935)〈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在屏東平原閩客語分布區內有6個西拉亞平埔族的部落，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5)楠梓仙溪上游(三民鄉)和荖濃溪上游(桃源鄉)小川尙義(1907)劃入鄒族的分布區，小川尙義、淺井惠倫(1935)進一步標示其方言(Kanakavu, Saaroa)，但在桃源鄉部分則多了幾個布農族部落。李壬癸(2004)也把這個地區劃入鄒語區。但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地區布農族已經佔了70%，顯示近百年來布農語向南鄒語分布區擴張的趨勢。

6)屏東三地門青葉村是個魯凱村，但前人的地圖都沒有標示。杜良君「本村居民全屬魯凱族，約一九三零年前後，在日本政府的輔導下，主要由大武村遷來，也有少部分來自佳暮、霧台及好茶。」(2003:79)可見語言分布的改變是移民的結果。

7)牡丹鄉濱海旭海村是個平埔族村，在過去的地圖都被劃入排灣族的分布區，本文標示為平埔族的閩南語分布區。

〈高屏地區的語言分布〉一文，無論就其調查目標、調查方法以及對現象的推論解釋，都是標準的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說此文是近代臺灣地理語言學的代表作，並不為過。

此圖也是區塊的彩色地圖，但有一個缺點就是圖中的行政區是以縣級作為底圖圖層，雖然有標示出地名，但各語言(方言)實際分布區域，仍不明確，若再加上鄉鎮級的行政區域的圖層，將會更清楚。

洪惟仁(2007)《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圖十三)

洪惟仁先生對台北地區的方言研究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1992年所出版的《臺灣方言之旅》中，已附有一幅〈台北地區方言分布圖〉。2007的《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則可說是洪惟仁先生這些年來，對台北地區閩南語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

文中根據方言比較的結果，歸納出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差的22個主要變項，並且列出各個變項的變體類型。再根據方言調查語料，將台北地區閩南語分成：

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偏泉(安溪)腔、老漳腔、偏漳腔等七個基本類型。偏漳腔和偏泉腔是攙入太多的泉音或漳音，其他方言類型則是自然分化的結果。台北地區唯一的方言混雜的閩南語分布區是烏來鄉，若把這個「混合腔」算進來，台北地區共有八個方言類型。

另外文中對大台北地區的閩南語分布提出六大觀點：

1) 從整個台灣北部來看，老漳區的分布區東北片由台北縣東海岸的三芝、石門、金山、基隆、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一直向南連接到宜蘭縣；由金山越七星山向南延展到基隆河岸的士林、內湖；西片老漳腔在台北縣西南邊越過龜山嶺的桃園台地北半部(蘆竹鄉除外)，本片大部分在桃園縣內，只有鄰接桃園、八德兩市的鶯歌西部的中湖地區是老漳腔方言深入台北縣的小塊。兩片老漳區和烏來的泰雅語區形成一個外環，把泉腔方言包在環內。

2) 整個台北盆地及盆舷地帶像一個大布袋，淡水河口譬如布袋口。布袋的外緣除了基隆河以北士林、內湖兩地的漳腔區以外，其餘的廣大地區都是泉腔方言的分布地。布袋的底部是安溪腔區，位在布袋的頸部及口部是同安腔區，而新店溪和大漢溪的交匯處，是安溪腔和同安腔兩個方言區的交界。

3) 台北泉腔布袋的中心卻又包著一個板橋中和區的漳腔方言片，形成了一個漳腔方言島。整個台灣北部地區形成了漳包泉，泉包漳的地理形勢。

4) 漳泉交界地帶的板橋和大稻埕附近是清代分類械鬥最嚴重的地帶，同時也是方言接觸的「前線」，方言融合的「爐心」。東北海岸的老漳腔和泉腔方言有大屯山、中央山脈、基隆河等自然疆界阻隔，老漳腔區成了偏遠地區，不容易受到泉腔的影響，因而比較能夠保存老漳腔的特色，但士林和板橋就沒有那麼單純，都接受了不少的泉腔特色。接近士林、大直的大稻埕、大龍峒同安腔，也受到漳州腔的影響，相對的士林漳州腔也相當的泉腔化，但漳泉分別還是很明顯，老派還保存相當多的特色。漳泉方言融合最嚴重的是第二個爐心大漢溪下流。以大漢溪為界，西岸的樹林、新庄屬於「偏泉腔」，東岸的板橋、中和、土城的漳腔方言四面被泉腔方言團團圍住，不能不受泉腔影響而變成「偏漳腔」。

5) 安溪腔分布在台北盆地南半部和其南舷山區。距離「爐心」越遠的地方就越能保存原鄉的方音。「老安溪腔」分布在台北盆地的南舷地帶，因為遠離了「爐心」，才能保存老安溪腔；距離「爐心」越近的地方越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接受其他方言的成分，或者受到牽引而及早發生自然演變，這些地方就變成「新安溪腔」了。更有進者，以安溪腔為底層的樹林、新莊因為雜居了一些漳州人，影響之下，混雜了更多的漳州腔成分，因而變成了「偏泉腔」。

6) 同樣的，老同安腔分布在偏僻的淡水河口，遠離了「爐心」，因而能夠保存同安腔的央元音特色，越往上游，越接近「爐心」的三重、大稻埕都喪失了央元音而變成「新同安腔」了。同為「新同安腔」，最接近大稻埕「爐心」的地方，如大稻埕受到漳腔的影響最大。只有有自然疆界保護的同安腔方言才能減少被融合的速度，永和和社仔島就是例子。永和雖然和中和的漳州腔區交接，可是其東、北、西三面都被新店溪所包圍著，在福和橋開通以前是一個交通不便的閉

塞地帶，因而奇蹟似地保存了老同安腔的特色；還有社仔是一個封閉的洲島，在百齡橋開通以前，也是一個閉塞的地方，因而在新同安腔方言中保存最多的同安腔特色。

本文末附有 26 張語言地圖(1 張臺灣語言方言分布圖、24 張台北地區變體、1 張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均為彩色圖)，較潘科元的地圖更為細緻，不僅有標示出各鄉、鎮、市的行政界線，在方言界線上則是細緻到村、里。是目前所見最細緻的臺北地區的方言分區圖。

張屏生、李仲民(2006)《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圖十四)

張屏生、李仲民合著的《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發表在第六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是由張屏生負責語料調查的部份，李仲民負責以 GIS 軟體繪製語言地圖。此論文主要討論的重點在於：一、對澎湖縣白沙鄉閩南話錯綜複雜的情形，提出地理語言學上的解釋。二、對於像白沙鄉閩南話這樣錯綜複雜的語言情形，在語言分區問題上的再次檢視，這二大主軸上。文末並附有廿四張彩色的語言地圖，其中廿一張是 21 個詞項的個別分布圖(一個詞項一圖)；另外三張是綜合地圖。

由於本文是屬於微觀的語言地理的調查研究，因此在方言分區上不能以傳統的宏觀方言分區條件為依據，所以文中是就單一詞彙做討論。而這些有方言差異的詞(不同「變體」(variant))，都可以將其視為方言分區的特徵詞。並將這些特徵詞，歸納成：1.泉、漳腔的差異。2.白沙鄉境內的區域性特徵。3.詞彙。等三個範疇來分別討論。最後歸結出白沙鄉的閩南話錯綜複雜的因素：

1)白沙鄉本身居民原籍的分布。就移民歷史而言，漢人來到白沙鄉的歷史大約只有四百年。在這短短四百年的時間中，語言雖然足以發生變化，但它的變化仍然有限。所以在方言差異的分布上，仍難脫離居民原籍的分布情形，這也成為影響白沙鄉閩南話的方言分布，最大的因素。由於白沙鄉居民的來源泉州、漳州都有，所以偏泉腔與偏漳腔各自對外擴散，造成白沙鄉內部獨立的泉、漳腔競爭。

2)受澎湖縣優勢閩南話的影響。在澎湖的最佔優勢的閩南話，是同安腔(偏泉腔)。所以在同安腔(偏泉腔)為優勢腔的澎湖縣，白沙鄉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這層外力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泉腔的競爭力(如「關官^白」韻)。

3)受臺灣的優勢閩南話的影響。近年來由於媒體、交通的發達，臺灣的優勢閩南話挾此優勢，大舉入侵澎湖群島。而臺灣的優勢閩南話是偏漳腔的混合腔，這層外力又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競爭力。然而臺灣的通行腔雖然是屬於偏漳腔，但是不可否認的，它是一種「泉、漳濫」的混合腔。因此雖然它加強了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競爭力，但卻也加速破壞了原本在白沙鄉境內偏漳腔的地區特色(如「毛禪^白」韻唸 uinn)。

就其價值而言，張屏生、李仲民合著的《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是臺灣地區第一篇以微觀的地理語言學的角度，對一個鄉進行方言分區的學術論文。另外將區內所有的方言變體都分別討論、繪圖，也是臺灣地區地理語言學上

的首次嚐試。

這批語言地圖都是利用 GIS 軟體繪制而成，表現法是結合網格區塊圖、方言分區圖和方言特徵圖而成。所以無論以彩色或黑白印刷，均十分清晰。此圖整體而言相當的美觀而清晰，並且縮尺、方位標示俱備，符合地圖製圖的標準。

鄭錦全的新竹縣新豐鄉的調查研究（2003~）(圖十五)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於 2003 開始進行「語言典藏」計劃，其中「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子計劃由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鄭錦全院士所主持。本典藏計劃，主要是從「歷史語言」與「語言分布變遷」這二個角度來建置閩南語典藏資料庫。本計劃自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執行，初期擬以大眾文學之劇本、歌仔冊二種文體為範圍，建立閩南語語料庫，這是「歷史語言」的部份。另以閩客雜居的新竹縣新豐鄉為對象，調查居民用語變化。再輔以新竹地區之客家民歌——渡臺悲歌，研究閩客用語交互之影響，這則是「語言分布變遷」的部份。與本文相關的，是此計劃中的語言分布變遷地理資訊系統。由於調查目的在於「調查居民用語變化」，所以採行挨家挨戶的訪問的方式。問卷有二部份，一為住戶資料和語用習慣的調查問卷，一為二十詞左右的調查字表。特別的是在調查的同時對此住戶進行 GPS 定位，以求得此建物的地理位置，以便將所得的資料輸入 ARC VIEW 地理資訊軟體。其方言地圖呈現方式，是以向量化的黑白空照地圖，加上所調查的家庭的方言的紅、藍標誌，紅色代表客家話，藍色代表閩南方言，清晰且精確地呈現出閩、客二方言分布的情形，目前完成田厝、楊屋附近約 200 多戶的調查³¹。

此圖在臺灣的語言地圖的繪製上，有其創時代的意義。因為此圖將 GIS、GPS 和空照圖相結合，為臺灣的語言地圖的繪製的精準性以及細緻性，開拓新的視野。

張素蓉與簡秀梅的「類型指數分布圖」(2006)

在張素蓉的碩士論文《台中縣海縣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中有附 15 張彩色的「類型指數分布圖」(圖十六)，在簡秀梅的碩士論文《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中則附有 6 張彩色的「類型指數分布圖」(圖十七)。她們的研究方法都是利用社會語言學的統計方式，將所討論的音類運用統計法計算這個音類中產生變化的比例，再轉化成數字化的指數 (index)，然後結合地理語言學做指數高低的分布觀察³²。這類的研究主要在觀察方言變異的「連續性」(continuity)，是成漸層變異 (gradation) 的現象。

兩人雖然都是繪製「類型指數分布圖」，但展現方式略有不同，張素蓉是將

³¹由於本計劃尚在進行中，所以相關資料非常零散，本論文所述內容，是由：2002 臺灣語文學會所主辦「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的專題演講、2004 慶祝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正式成所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專題演講——語言與資訊、以及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印贈的《語言典藏資料庫簡介》2004，等資料中整理而成。

³² 洪惟仁稱這種研究法為「社會方言地理學」。

指數標示在地圖中，並配合區塊圖來表現。而簡秀梅則是不標示指數，直接利用色階的區塊圖來呈現。這兩種方式都是想要試圖呈現出語言波導(wave)的現象，但可惜的是效果均不是十分理想。張素蓉雖然標示出指數，但由於調查的地點不夠細密，所以空缺極多，其區塊只能依循行政區域來區別，所以無法呈現出明顯的波形。而簡秀梅的以色階來區分，但由於色差不大，所以波形特徵也並不顯著，以簡秀梅調查的細密度而言，卻未能將波形特徵展現出來，實在可惜。筆者以徒手勾勒的方式，依簡秀梅的資料重新繪製，如圖十八，當我們標示出每一個村、區的指數之後，再將同指數的地區以線條連接形成等語線，如此波形便清晰可見了。

總結上述「日治時期」、「戰後」與「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發展的三個時期，臺灣地理語言學由日治時期的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為發端。此時的語言地圖仍有濃厚的人文地理色彩，但為臺灣地理語言學和語言地圖的繪製奠定基礎。

但在「戰後」時期，由於外在條件以及地理語言學的觀念還不甚發達，傳統方言學仍居主導地位的情形下，呈現中衰之勢。此時期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仍是以巨觀為主流。但這些研究，除了吳守禮外，並未承襲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不過在此時期也有創新開創之處：

1、調查研究視野的擴展。顧百里(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是臺灣第一部以縣級為調查範圍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李仲民(1998)《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則是臺灣第一部以鄉級為調查範圍的地理語言學研究。中觀與微觀研究的出現，大大增加了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範圍和深度。

2、重視實地語料的蒐集。重視實地語料的蒐集，是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基本精神。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是臺灣地區真正透過語言調查，並繪製語言分布地圖的第一部研究。書中所附的語言地圖，是經由語言調查所繪製的臺灣第一幅方言特徵圖。而顧百里(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的調查研究，他的調查點遍布每一個村里，並進行實地調查。這些創新的研究方法，為今日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留下了典範。

隨後洪惟仁進行臺灣語言的調查研究，於1990年出版《臺灣方言之旅》。這是臺灣第一本對臺灣語言的分布，與成片方言綜合討論的專書。此書深深地啟發了現今從事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的青年學者，為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的蓬勃發展，奠下厚實的基礎。

「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發展，經過諸位前輩學者的努力，終於讓地理語言學在臺灣生根茁壯。分析下來，「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發展有以下三大特色：

1、臺灣的地理語言學逐漸跳脫大陸傳統方言學的窠臼，走向注重共時研究，並且細緻化、跨學門化以及資訊化的發展方向。

2、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多樣化，不論在全省或是區域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最富特色的，是在地理語言學微觀上的研究成果。在微觀研究上，除了以鄉級為

調查範圍的研究大量出現外；鄭錦全在新竹縣新豐鄉的調查研究，調查至每一戶，更是劃時代的創舉。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並在 2007 年 9 月 27~28 日，舉辦第一屆「語言微觀分布國際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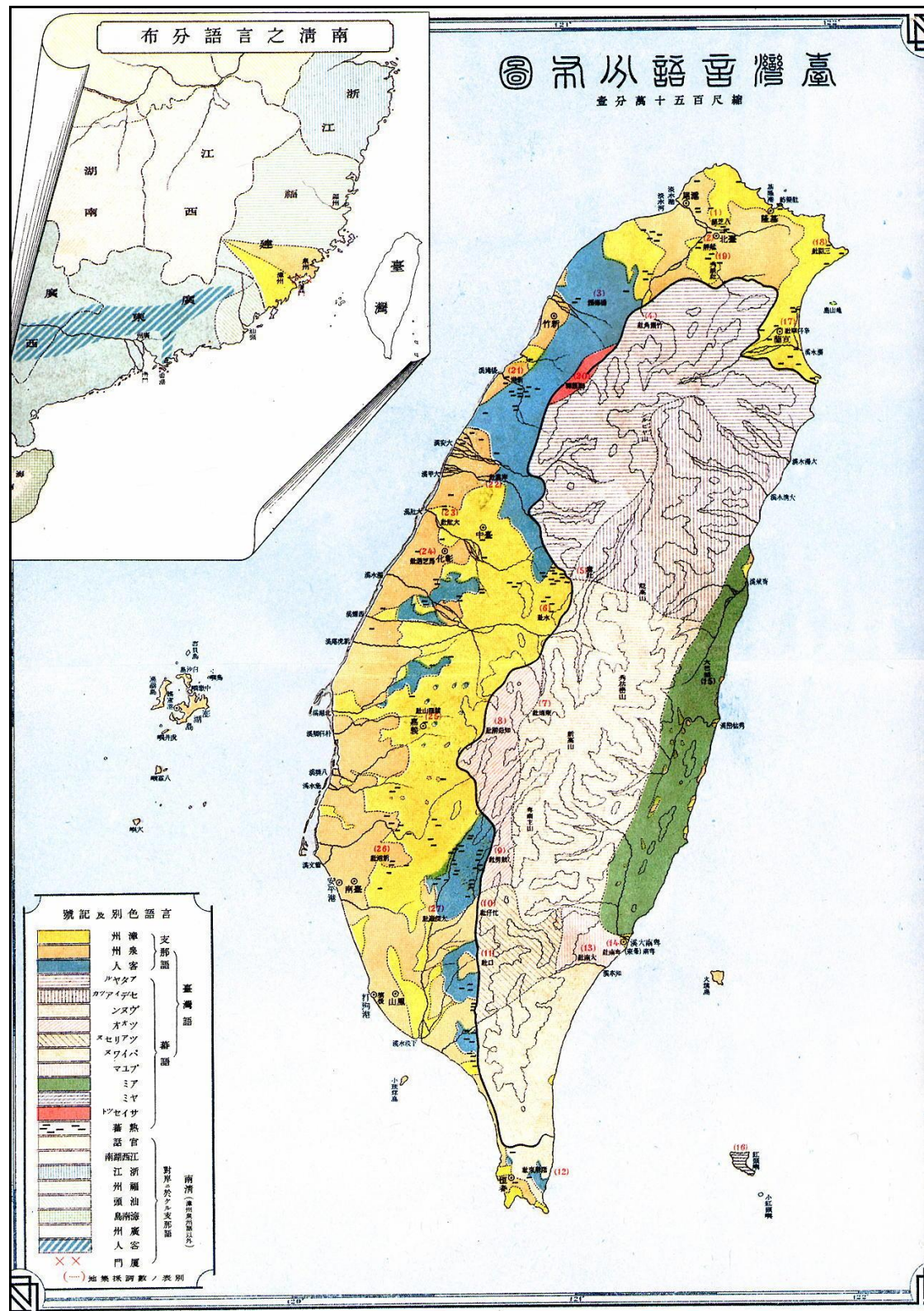
另外一個創新的研究方法，是將地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相結合，進行地理語言學的立體化研究。洪惟仁與張素蓉、簡秀梅的研究，是這類研究的代表。

3、語言地圖的繪製日趨精細。從戰後的徒手描繪，至今日大量運用電腦的繪圖軟體來輔助，更進步到結合 GIS、GPS、空照圖等數位化資訊系統。這些資訊系統最大的優點，是使地圖的繪製更加精美和準確，並且能與資料庫系統相結合。利用資料庫系統的強大資料處理能力，「社會方言地理學」才得以加速進展。只要建立好電腦資料庫，GIS 便能立即將地圖繪製出來。由於 GIS 能重疊多個圖層，所以可以將同一地區的不同語言特徵的語言地圖重疊，輕易地便可以比較不同語言特徵間分布的情形。相較於百年前的文克爾的德語地圖集中，給每幅地圖預備一張透明的散頁，以便比較，不知進步多少。更重要的是，資料庫是可以隨時增添或刪改資料並且可以做資料整合，所以語言地圖也隨時可以更新，並且將他人的調查資料整合進來，使資料更豐富。所以 GIS 的運用，使得語言地圖活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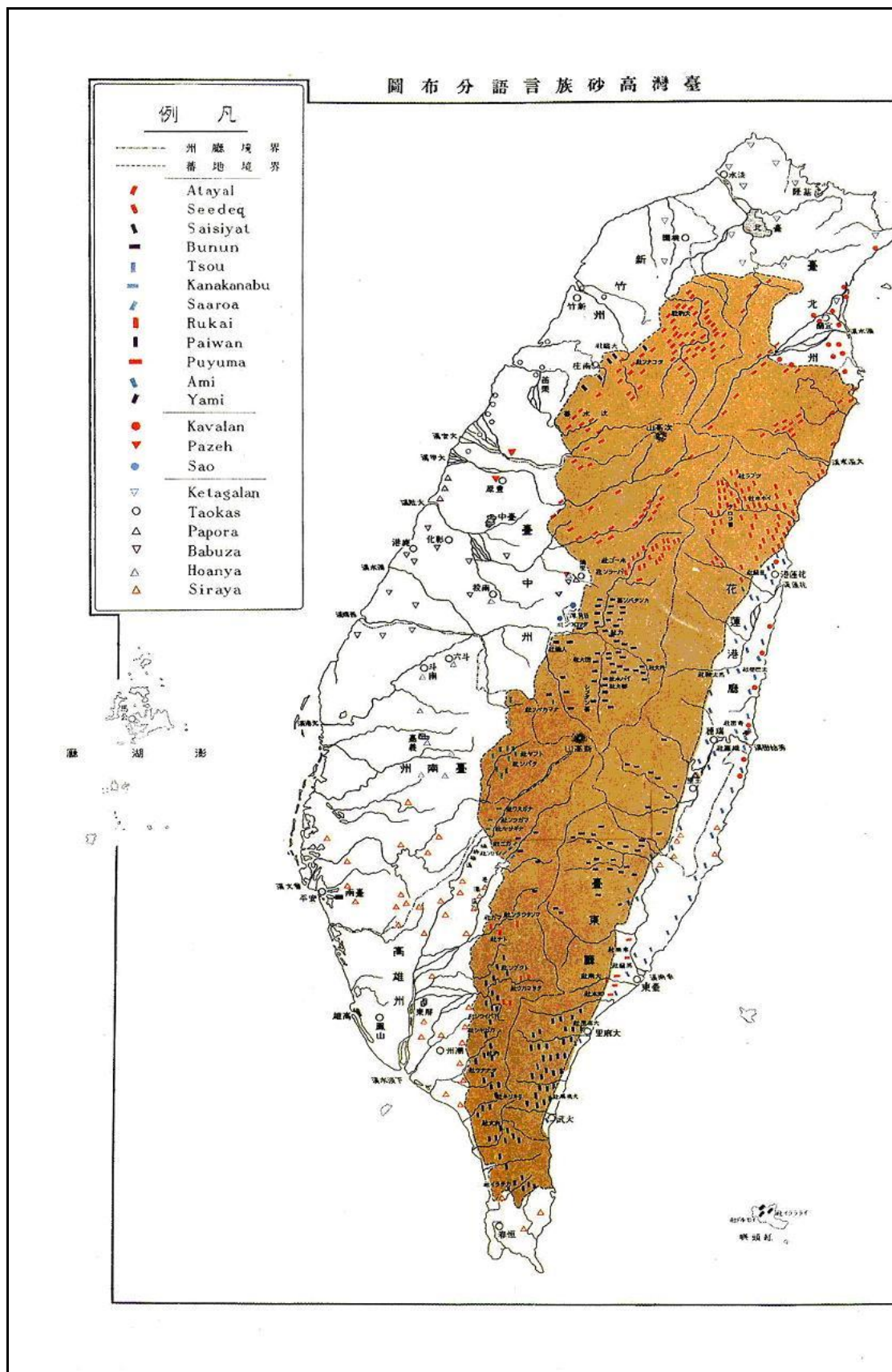
可預期的，在現今臺灣地理語言學的蓬勃發展下，未來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將陸續出現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圖一、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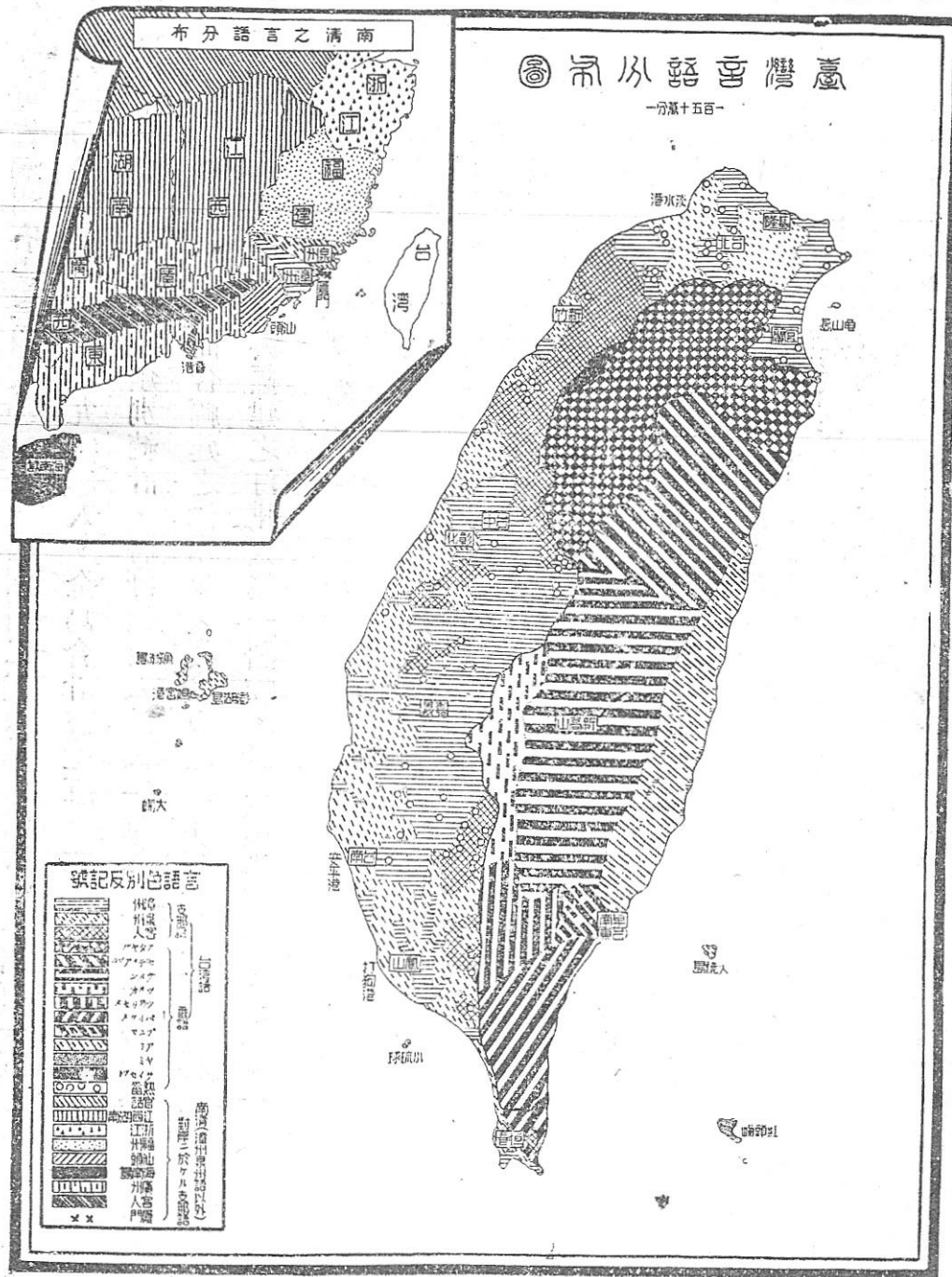
圖二、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高砂族言語分布圖〉(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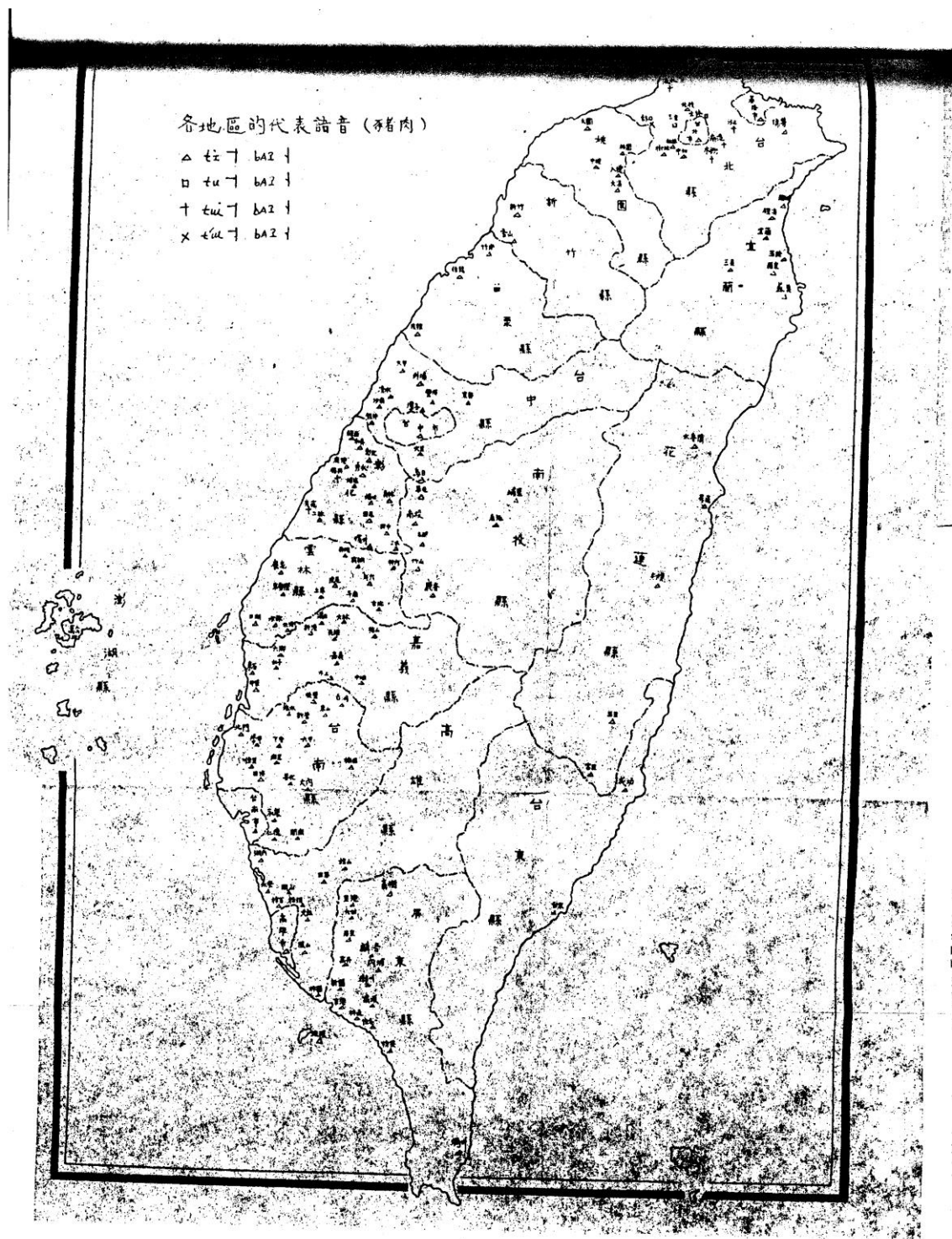
圖三、吳守禮「民國前五年臺灣言語分布圖」(1954)

一 圖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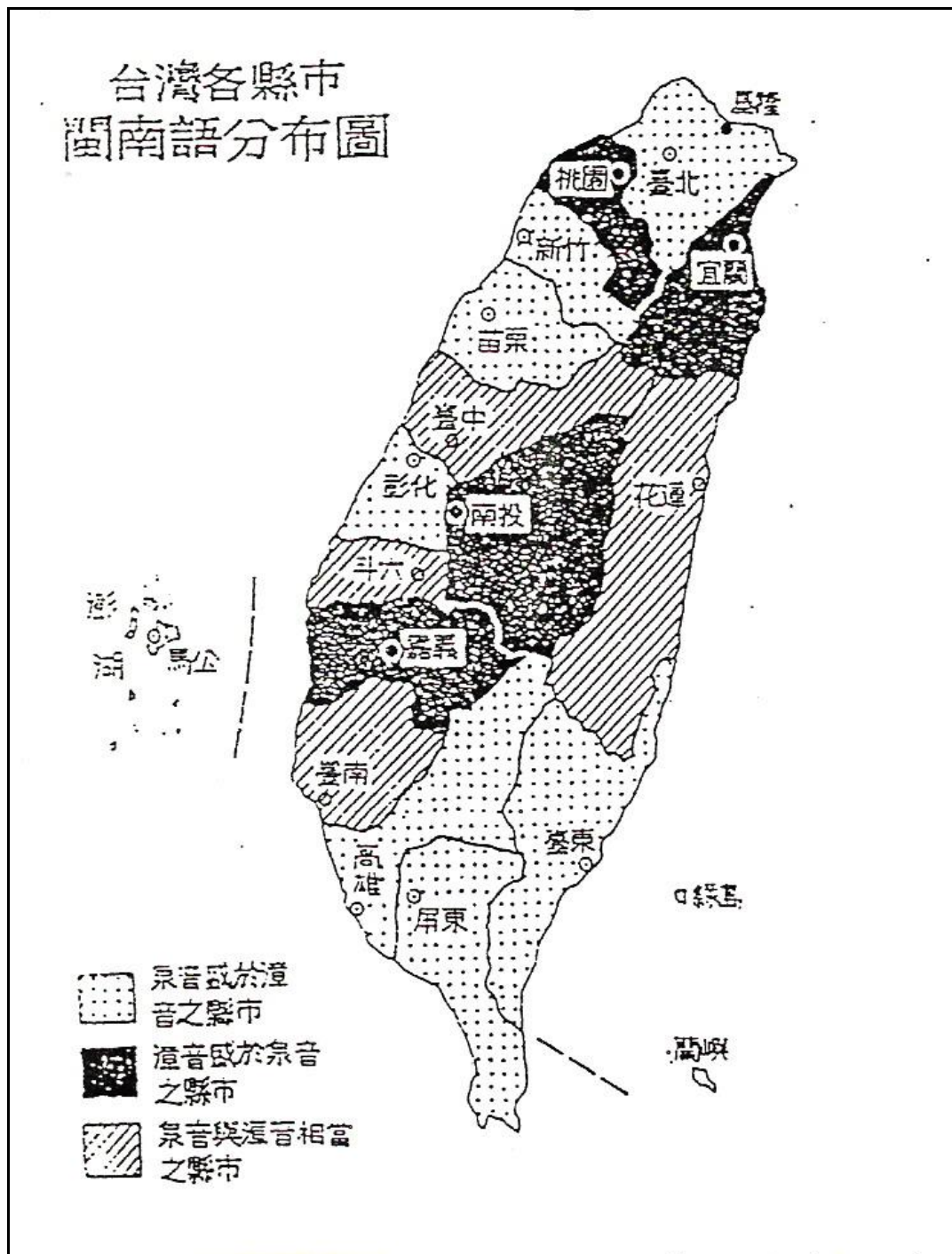
(錄附典辭大臺日年十四治明本日載轉) 圖布分語言灣臺年五前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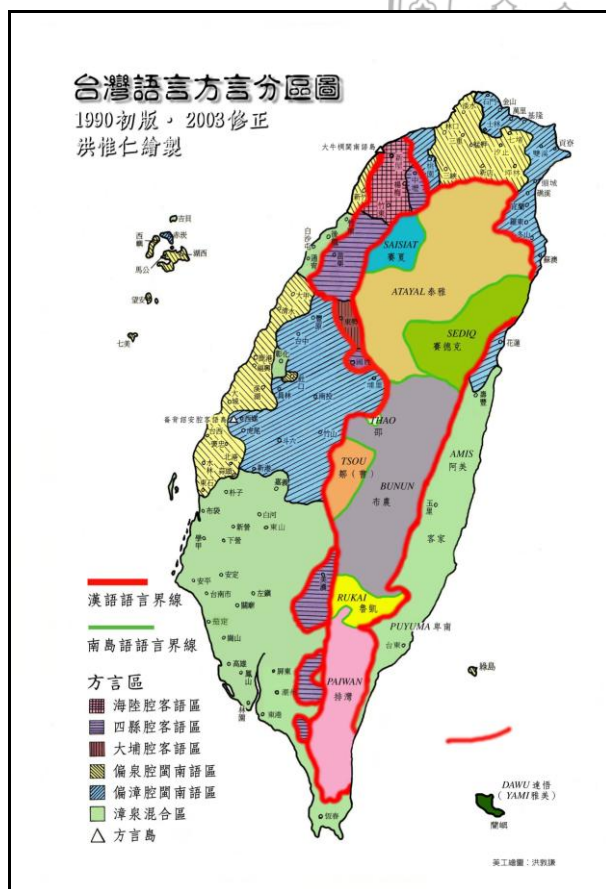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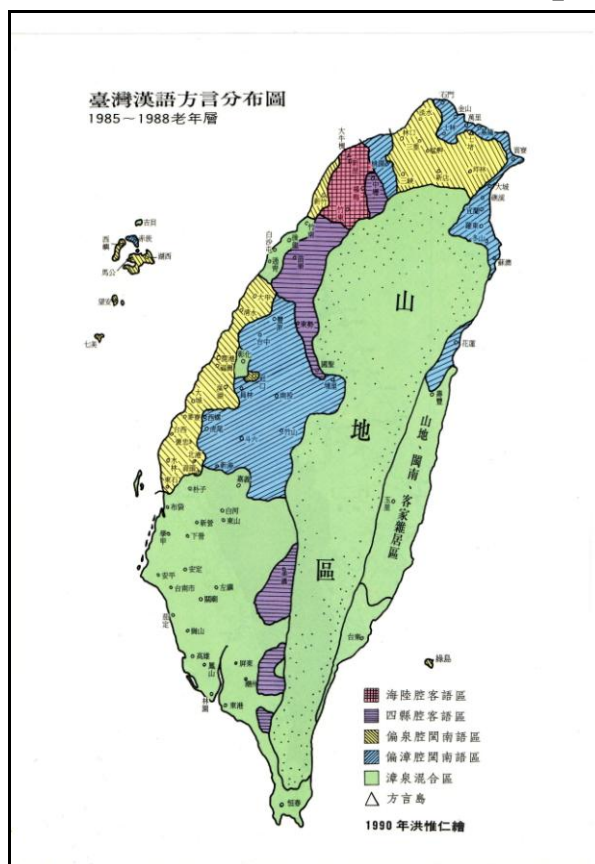
圖四、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豬肉」(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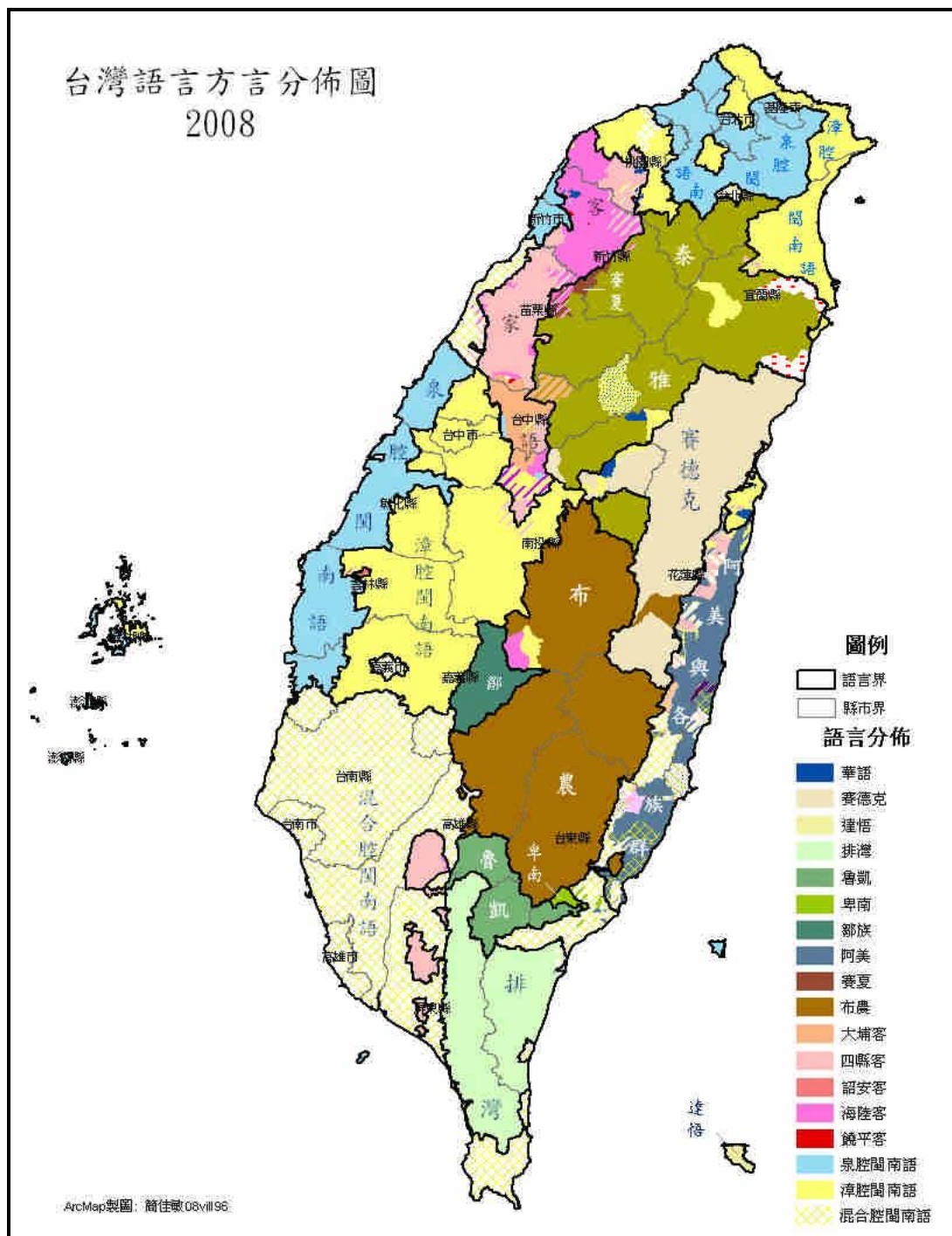
圖五、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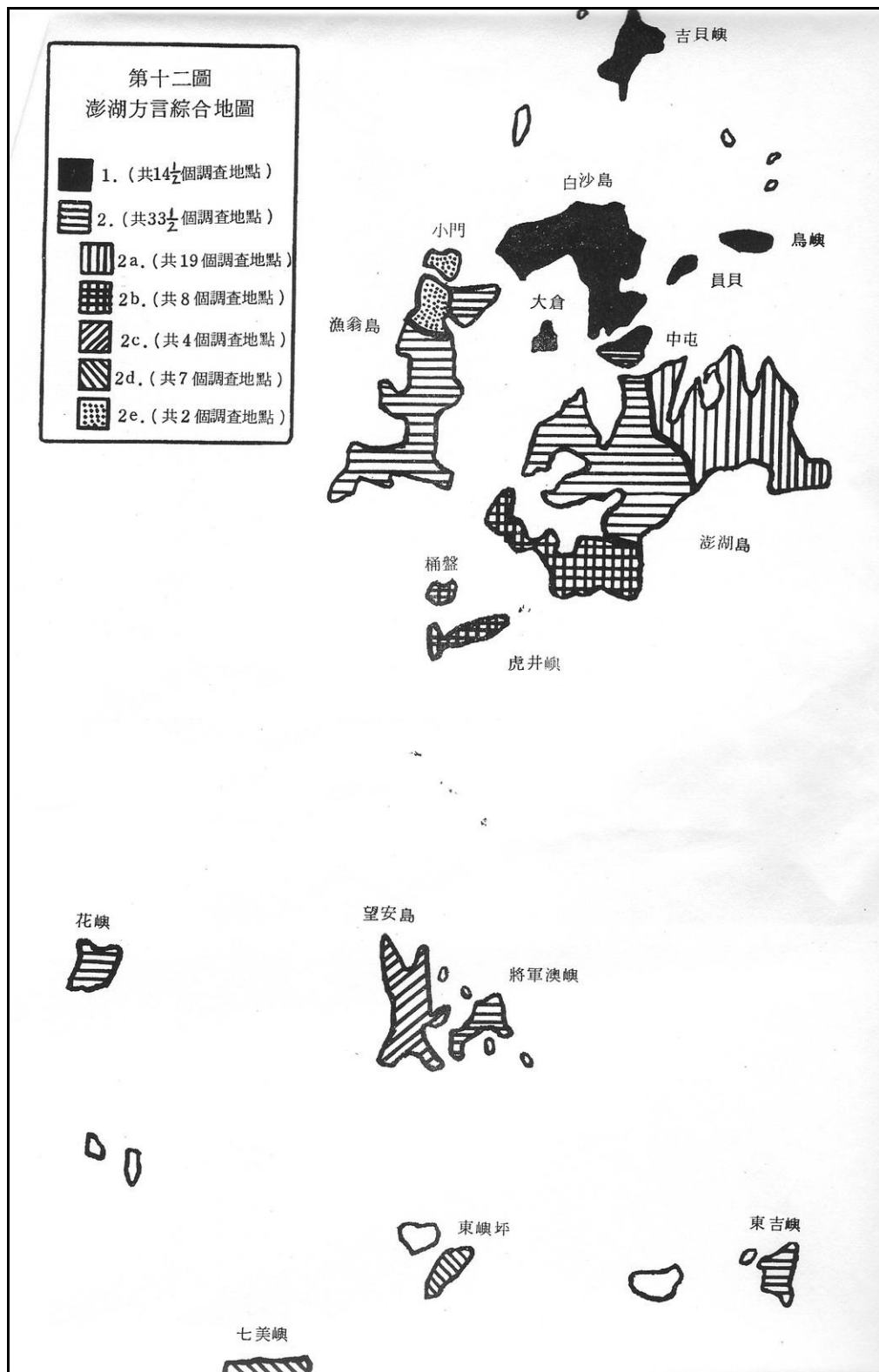
圖六-1、洪惟仁「臺灣語言方言分區圖」(1990、2003)



圖六-2、洪惟仁「臺灣語言方言分區圖」(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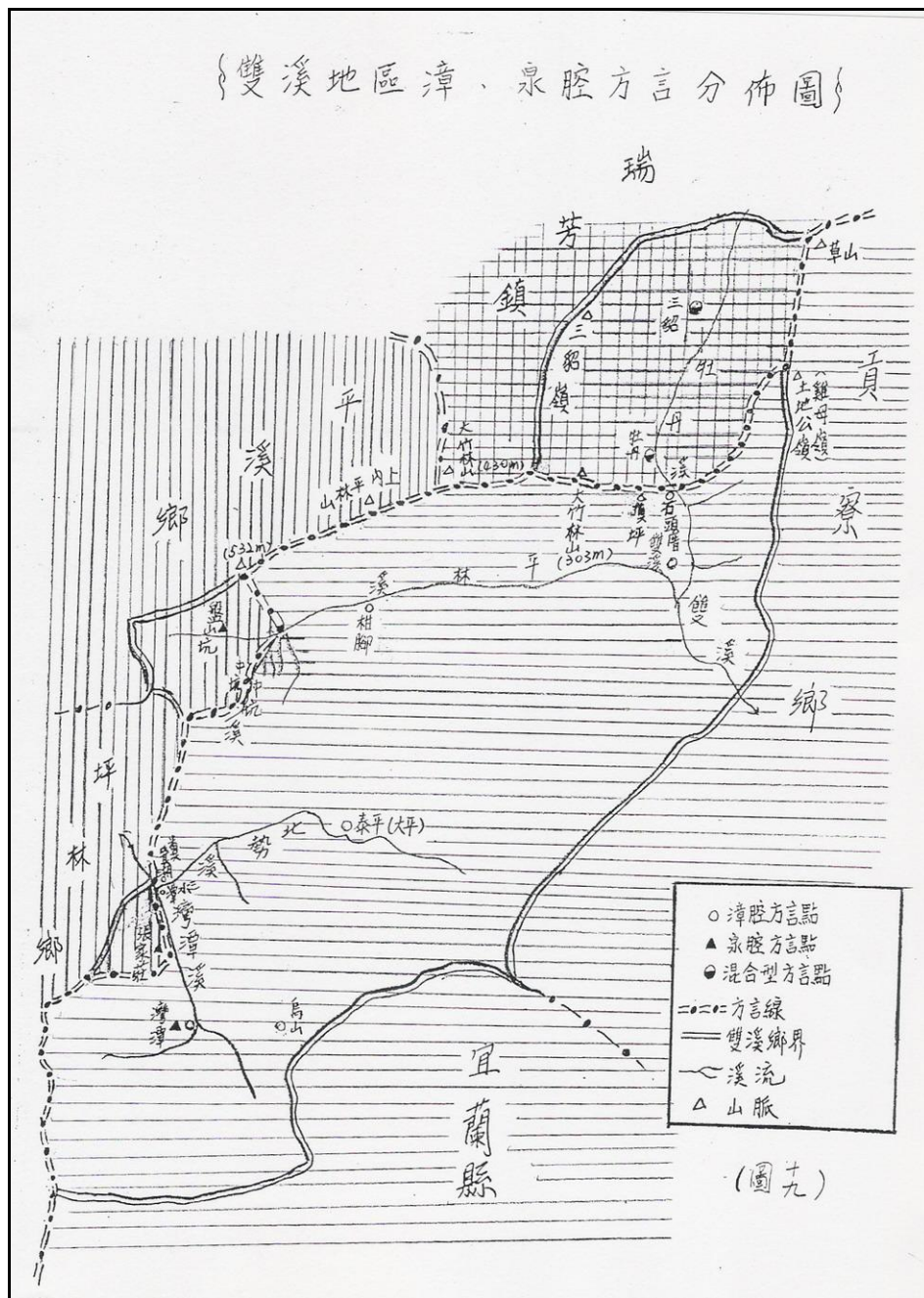
圖七、顧百里《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澎湖方言綜合地圖」(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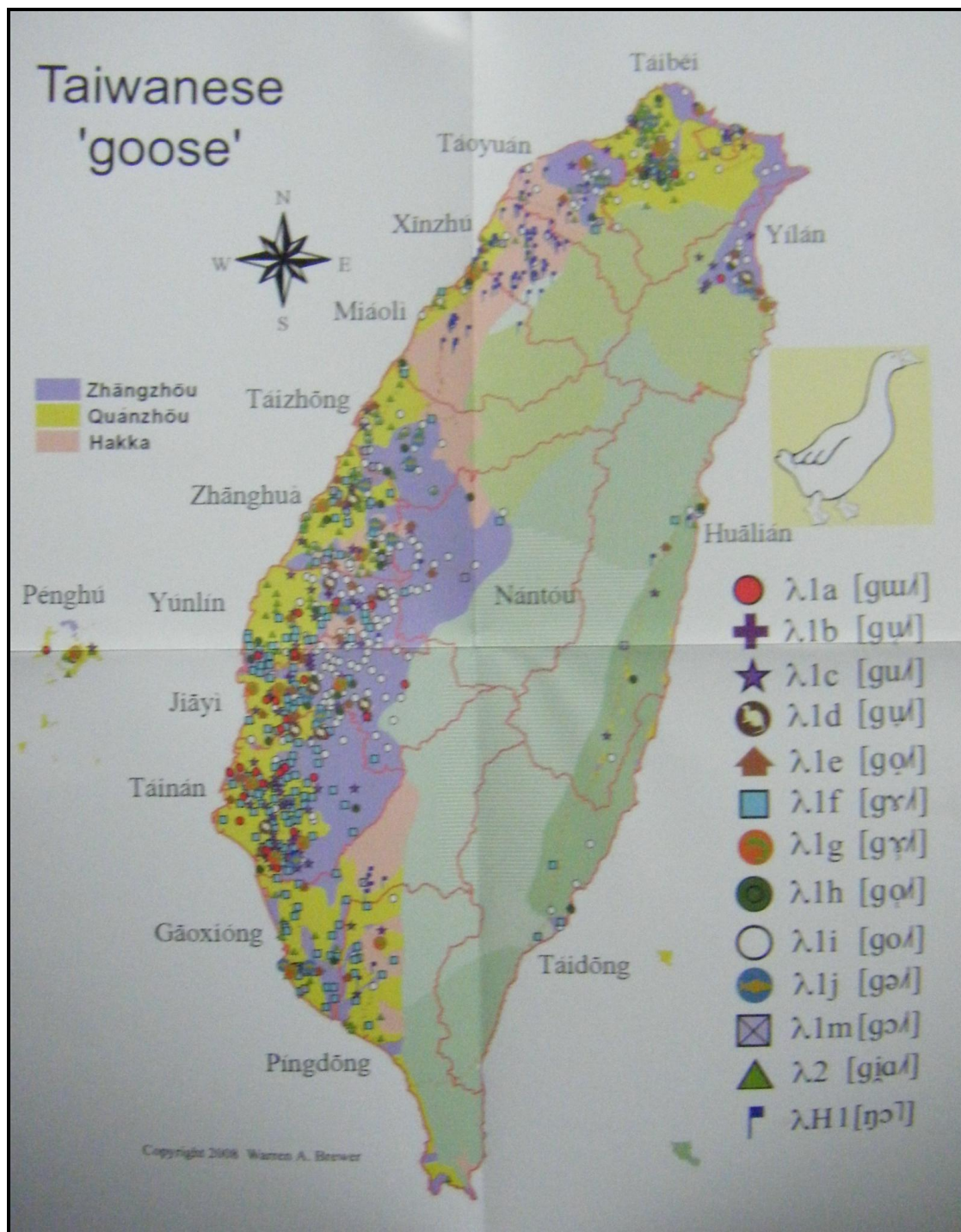
圖八、潘科元「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布圖（老年層）」（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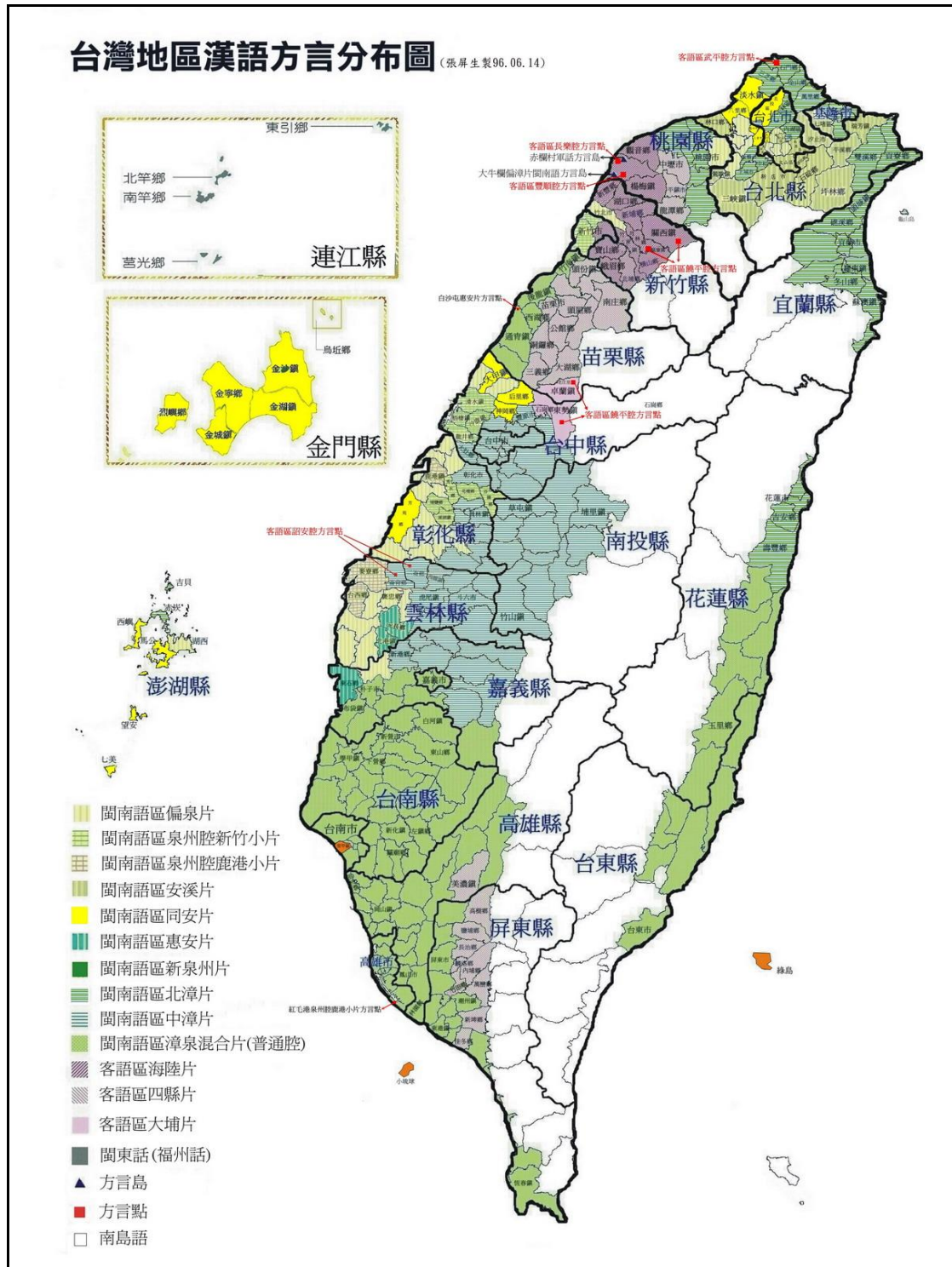
圖九、李仲民「雙溪地區漳、泉腔方言分布圖」(1998)



圖十、卜溫仁《臺灣語言學圖集》----鵝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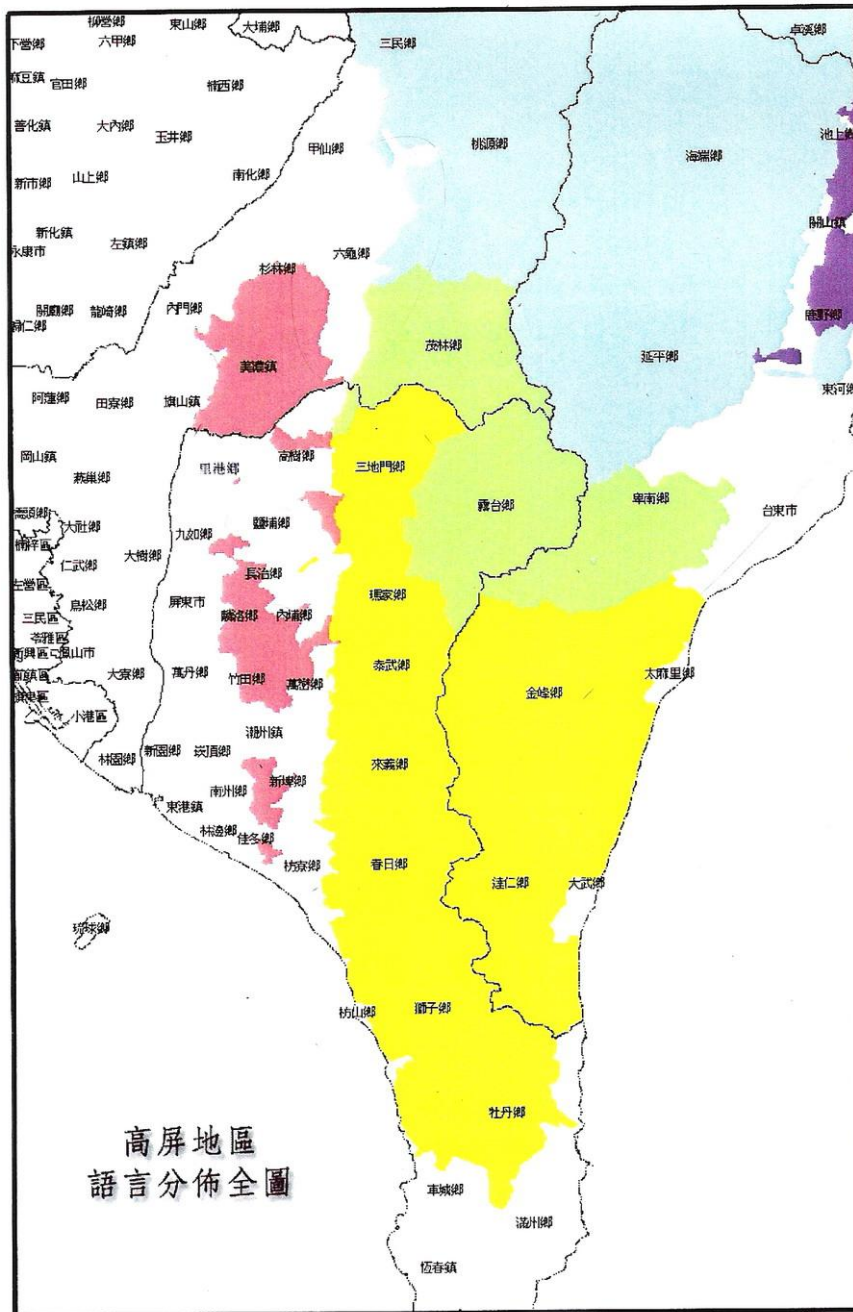


圖十一、張屏生「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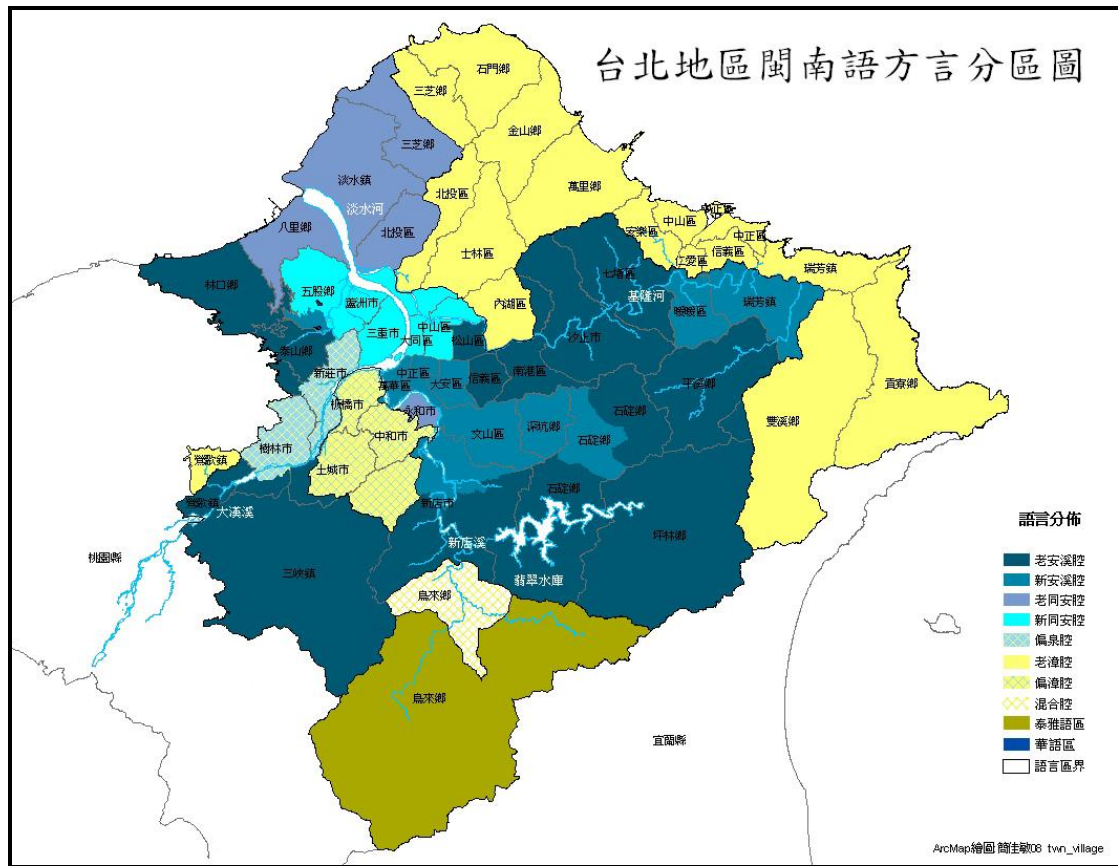


圖十二、洪惟仁「高屏語言分布全圖」(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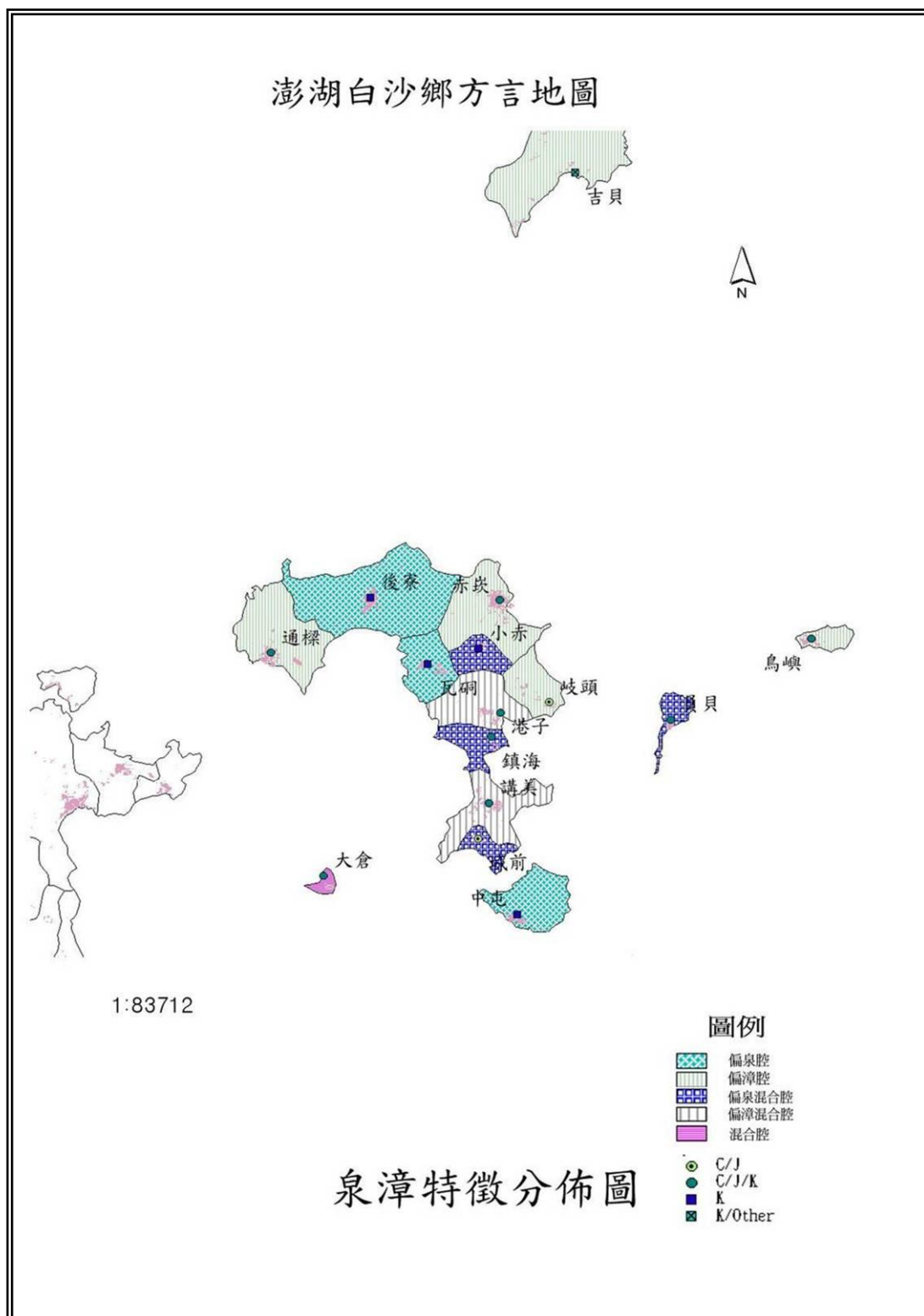
【附圖 10】〈高屏語言分佈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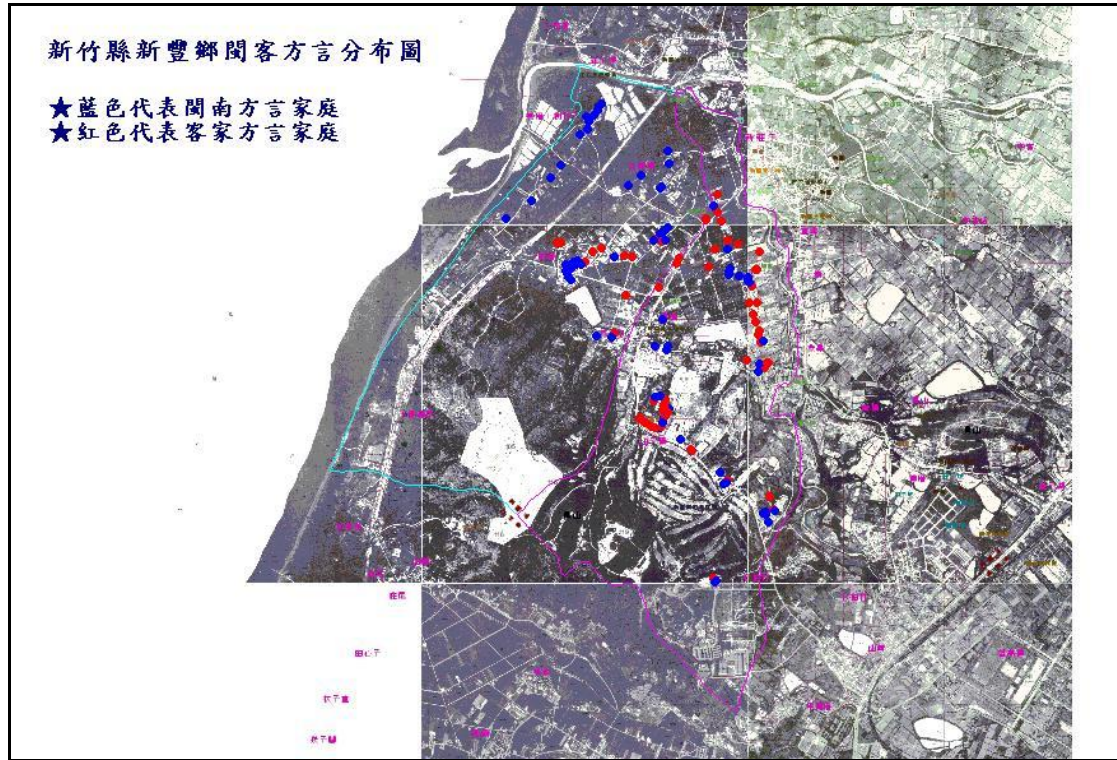
圖十三、洪惟仁「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2007)



圖十四、張屏生、李仲民「漳泉特徵分布圖」(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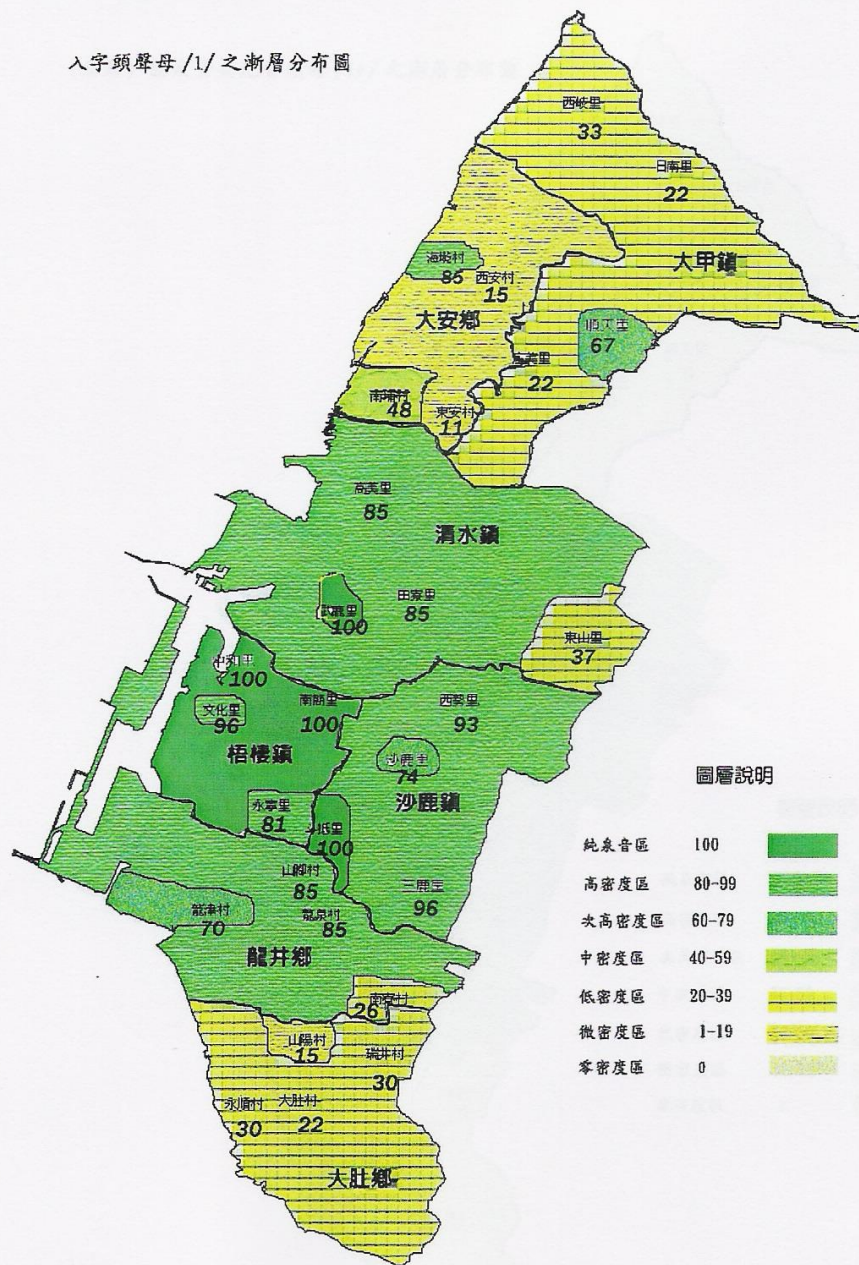
圖十五、鄭錦全「新竹縣新豐鄉閩客方言分布圖」(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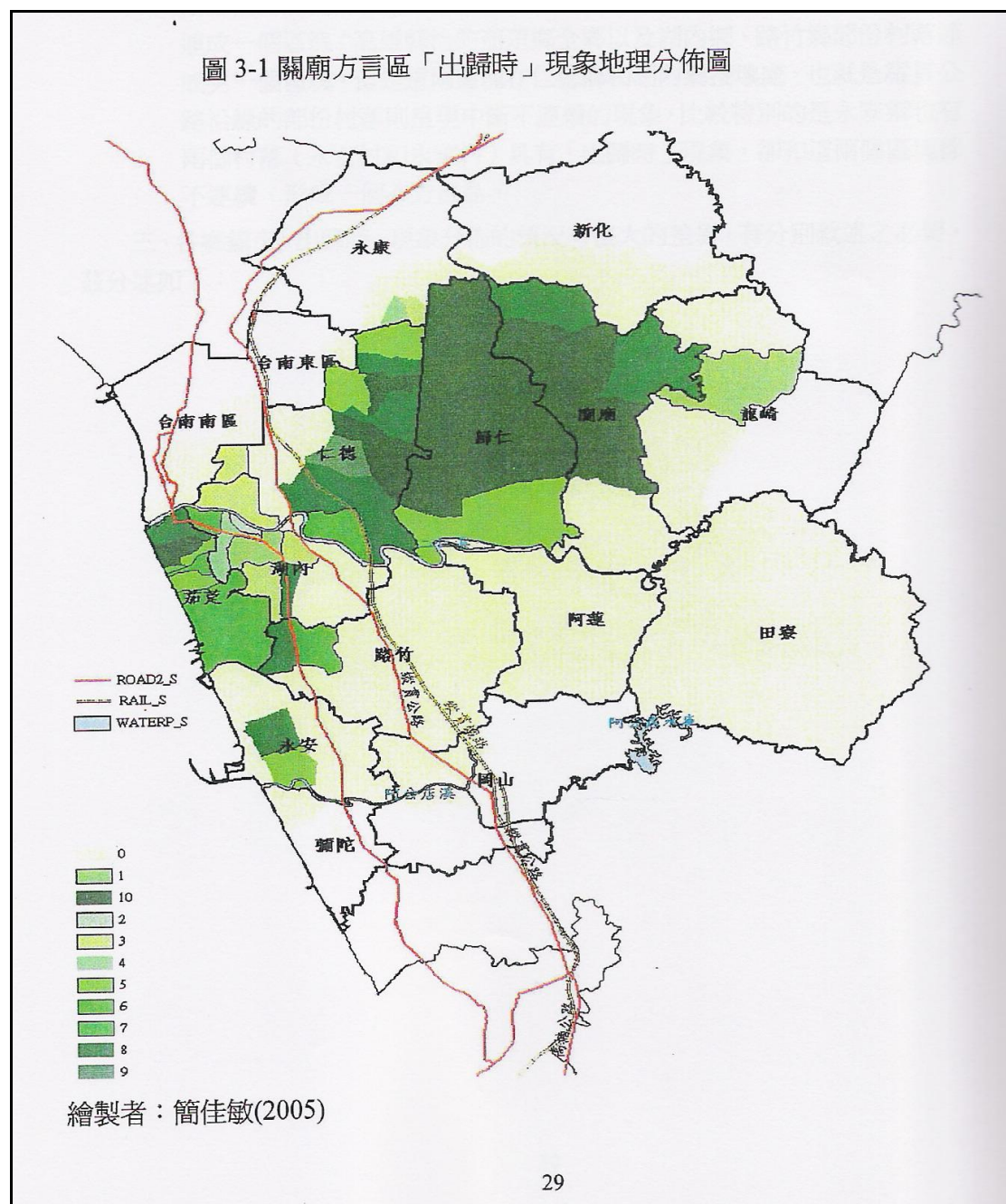
圖十六、張素蓉《台中縣海縣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2006)

【附圖5】入字頭聲母/l/之漸層分布圖：

入字頭聲母 /l/ 之漸層分布圖



圖十七、簡秀梅《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2006)



圖十八、李仲民改繪簡秀梅「關廟方言區」
「出歸時」現象地理分布圖

